

二

残暴的归屯并户

抗日战争图书馆藏书
www.krzzjn.com

伪满集团部落 ——宝清县归屯前后

石丕城

伪满洲国康德5年（1938年）春，我二哥石丕君被日伪抓去修筑方盛、望山坡两个“示范”屯。不久，我和父亲也被赶去修建双柳河子、高家围子、付家围子。那年我家住在大孤山东南甸子。先是归划高家围子管辖，被迫搬到高家围子。盖了个草窝棚住了进去，勉强遮风挡雨。可是不久官府又说我们应归付家屯。我父亲只好拆了草窝棚，去付家屯盖了简易马架子房，把家搬了过去。在付家屯住了2年。

一、归屯建部落的情形

1935年开始，宝清地区抗日斗争活动日趋活跃，各路抗日联军经常出没于我县南、西、北三面山区，屡挫日伪军警的“围剿”和“讨伐”。

日伪为了切断当地人民群众与抗日武装的联系，妄图最后消灭我抗日力量。根据伪满洲国民政部1933年12月3日发布的《集团部落建设》文告，于1938年春，在宝清全面实施归屯集甲，建立集团部落（老百姓通称为屯子或围子）。那年春，大地刚刚化冻，日伪在各区各甲，强迫青壮年齐集方盛、望山坡两地，修建“示范部落”。赶到种大田时节，在全县全面铺开，按原甲管辖范围，划片建屯，统一按方盛、望山坡模式，修筑土围子。到1939年，全县共建成约45个部落。

部落的位置，一般的尽量避开山区、林区，设在开阔平原

地带。如：西部地区的大、小梨树沟子一带居民，均迁到靠山、望山坡；黑瞎子沟、庙岭沟一带居民均迁到双柳河子；太平路一带迁到凉水泉子；锅盔山附近的一带迁到王福岗、杨荣围子等处。

每个部落，根据片内户数多少，确定占地面积和部落的大小。百户以上的均占地150余亩；40到60户左右的占地120—150余亩。部落大部建方型或矩型，草堡子垒墙。墙高3米，底宽半米，上宽半米。每隔3到4米上口设一垛口。四角处设4米见方炮楼，内侧有门，外侧三面各设炮眼1个。墙外挖护城壕，上口2米，底宽半米，壕深1米或半米。还有宽半米的环墙巡逻道。大的部落设两大门，如七星泡设东西2门；七星河设南北2门，余者均设1门。门的方向，视交通情况而定，一般都向交通要道。如：双柳河子设西门；高家围子设东门；付家、望山坡设南门。部落内按户数多少，划分2至4趟街，4个居民区，每区10到20户不等。

建设部落都在春夏时节，日伪不管农民春耕夏锄，警察和自卫团强迫12岁以上男子，不管老少，都赶到工地上去。所有耕畜，不论牛马驴骡，都得套上各种车辆、爬犁，拉土的拉土，运草堡子的运草堡子。另一部分，套上开荒洋犁，就附近甸子拉带草皮的土堡块，充做砌大墙的主要材料。车拉，爬犁拖，人挑，肩扛往墙上运。每日屯长、牌长分配砌墙、挖沟、运料并指挥群众干活。日本人、警察、自卫团监工。中午农民带饭，给一小时休息和吃饭时间，此外一天到晚再不准休息。干起活一个撵一个，递堡子得供上砌墙的，运堡子的得供上递的，上土的得供上墙上用，稍有点慢，监工的便说你“磨洋工”，便遭到日本鬼子、警察的鞭打脚踢，或集体罚跪。日伪警察捉弄人无奇不有。如修七星泡围子时，日本警尉长赖，谁出工出晚了或

干活慢了就罚谁骑在3米多高的单木大门梁子上。运草筐子的走路得带小跑，否则就拿洋刀背砍。

一边修围子，一边强令老百姓搬家。特别是离围子远的靠山边住的得首先搬进去。弄得农民来不及盖房子，只好搭个草棚子或挖个地窖子勉强住上。限期不搬的，讨伐队、兴安军就把原住房子放火烧掉。

日伪一方面强制老百姓归大屯，一方面对山区加强封锁。日本军、兴安军、山林警察队、讨伐队频繁对山区进行搜索、扫荡。逢人便抓，特别是兴安军闹得更凶。每次扫荡吃败仗回来，遇见可疑人便抓，不是说你是胡子，就是“红派”（指抗联）。要叫他们抓去，就别想好，不是砍头，就是送县监狱。我和父亲被赶去修双柳河屯子时，有一天，兴安军从庙岭沟（双柳河北沟里）打了败仗回来，抓来两名中年人，说是“红派”，绑在村口上。从民工中要了4个人（我也被要去了），在村东南角小山包（就是现在五九七中学那个地方）林子里，叫我们挖个大坑。随后他们把那两个人推到坑沿上，抽出马刀砍了头，又叫我们埋上。把我们吓得都没了魂儿。又有一次，有3个兴安军，抓了老百姓的鸡，抢了老百姓的粉条、白面，到老蔡家，硬叫蔡大嫂炖鸡、打饼，他们饮酒作乐。当饮到高兴时，叫大嫂也上桌陪酒，并乘兴轮奸了大嫂。糟踏得大嫂一个多月不能下地。

敌伪除了用强制的法西斯血腥镇压外，还搞出些软招子，宣传诱骗群众，说什么集团部落如何如何好。当时有宣传画，编歌谣等。企图瓦解与涣散群众的反满抗日的斗志，断绝与抗联的联系，如：当时有这样一首歌谣，我只记住其中一段：“秋日凄凉菊花新，我劝抗日军，你们快回心，满洲大国扎下根，各处日本军，讨伐队，进山林，见着房屋用火焚，你们无处去安身，何不投降改为民。”

由于当年修围子搬家，大多数农民没有种好地，撂地、荒地比比皆是，特别是靠边远山区的地几乎全撂了。弄得第二年屯电闹饥荒。农民只好用苋菜、灰菜当饭来充饥。有的家吃灰菜中毒，浑身发育，脸肿得挺大，腿肿得很粗，也无钱延医抓药，只好硬挺着，一天天地捱这暗无天日的时光。

二、归屯后的行政区划和日伪统治设施

宝清归屯后行政区划由原来的区、甲制改为村、屯制。村设村长1人，司计1人，助理1人，文书1人，跑牌的（通讯员之类）1人。工资、费用均由各屯摊派，每村管辖若干屯。屯设屯长1人，文书1人，跑牌的1人。每屯又按住户情况，按街道或居民点设牌，每牌辖10户到20户。牌设牌长1人，管理本居民区的事务。屯内的公务费用，按各户摊派。

1939年宝清县公署下设：

1. 宝清街公所，下辖四个城区，即安仁区、居义区、乐善区、业城区，简称安居乐业；六个城关村，即南元村、南亨村、南利村、南贞村，简称元亨利贞，东关村、北关村，简称二关。
2. 大孤山村公所，下辖7个屯，即十八里屯、十二里屯、付家屯、高家屯、望山坡屯、双柳河子屯、北八甲屯。
3. 凉水泉子村公所，下辖3个屯，即凉水泉子屯、巨宝山屯、二道山子屯。
4. 七星泡村公所，下辖10个屯，即七星泡、宴家油坊、李朱屯、平安堡、刘家炉、程家围子、曲家屯、兴隆岗、杨荣围子、王福岗屯。
5. 七星河村公所，下辖3屯，即七星河、常张屯、杨树林。
6. 青山村公所，下辖9个屯，即一甲、二甲、三甲、四甲、东五、西五、东六、西六、本德屯。

7. 夹信子村公所，下辖6个屯，即夹信子屯，徐马架子屯、靠山屯、头道河子屯、方盛屯、万金山屯。

8. 大和镇村公所，下辖大和镇。

日伪为了强化社会治安，加强了警察设施。当时大致情况是这样的：县设警务科，街、村设警察署。街内安、居、乐、业四个区设派出所，城关村设中央直辖派出所，各屯设自卫团。个别敌伪认为“麻烦”的屯，增设警察分驻所。当时设分驻所的有：头道河子、双柳河子、王福岗、杨荣围子、二道山子等处。

屯内实行“10家连坐”制，一旦1家发生问题，那9家都得跟着受连累。

三、集团部落的苦难生活

集团部落是一所大集中营。住进了部落里的黎民百姓，受尽了日伪官吏、警察、特务和地主武装自卫团的欺凌压榨和窝囊气，失掉了一切自由。

从1938年开始，城乡居民，一律实行“居民身份证书”制，简称“证明书”。老百姓管它叫“证命书”。认为没有它，就没有命了。凡年满12岁的，不分男女，均经警察署签发贴有1寸免冠照片的身份证。硬白纸片证外套硬玻璃纸皮，防雨防潮，便于随身携带。每当出入部落大门时，必须出示身份证，经岗哨检查后，方准放行。部落规定农民出入部落时间为早日出后，开大门，放农民出村下田；晚日落前必须归屯，日落便关大门（没有大门的，则用两架移动式铁丝网封锁大门）。农民如果回来晚了，只好在大门外过夜。如警察、自卫团高兴了，让你在外等三五人，再开大门，放进屯，但要受到打骂、训斥。

谁家来了客人，得持该人证明书去屯公所“挂条”，登记什么关系，来干什么，住几天，何时离去等事项。如不“挂条”，

晚间查夜检查出来要训斥、处罚，甚至坐牢。出门外出办事，串亲戚也得事先去屯公所登记，经批准后方可出去。延期回归者，除有去地证明外，都要受到审讯或给予一定处罚。

每个部落都有自卫团把门、站岗放哨，警察们进行监督。每晚要由屯公所派屯民若干，轮流值班，放游动哨，手拿木梆，沿周围墙内侧巡逻道，走两步敲一下，每逢墙垛口处，必须向外张望，发现可疑现象要立即向值班自卫团或警察报告。如警察或值班自卫团听不到梆子声，便认为游动哨偷懒或睡觉，找到便是一顿拳打脚踢，甚至蹲“禁闭”（那时警察署或自卫团部都设有带木栅栏单间小牢房，一般叫“禁闭室”）。

白天，警察官们经常在男人下田干活时间挨家串游，调戏年轻妇女。夜间，也常以查夜为名，去刁难男子。弄得百姓敢怒不敢言，只好“打掉牙齿往肚里咽”。部落内的人民负担，层层加码，有增无减。农民除了交“警学大租”和“门牌税”、“户口捐”、“牛马税”、“狗牌税”、“车牌税”等十几种苛捐杂税外，还得摊交地方村、屯公事款，连县、村官吏及警察们下屯的吃喝招待费，也得老百姓出。农民最苦的还数贫农和雇农。他们除了受官府和地方捐税杂款之苦外，还得向地主缴纳地租。辛辛苦苦劳累一年，到头来闹得食不饱腹，衣不遮体。那时我家6口人，只有嫂嫂家1个小孩不能参加劳动，其余5口人都能干活，一年到头，吃不上，穿不上的。父亲穿一条带花纹的“更生布”裤子，羞得老人家出门不敢抬头。更有甚者，如付家屯有个都兴才，两口子穿一条破单裤，早起做饭老婆穿；下地干活丈夫穿。炕上连条被子都没有，只好钻进麦滑秸里遮身取暖。

由于集团部落的政治统治严酷，经济封锁严紧，加之边远土地瘠荒，官府和地方官吏的搜刮，地主的残酷剥削，人民生活日益低下。有病无医又无钱，广大劳苦群众每日挣扎在死亡

线上。归屯后的1939年春，普遍流行“窝子病”（传染病）。一病就是一家子，轻则常年不断，老的好了，小的病倒；重则丧命。特别是小儿麻疹病流行严重，仅1938年冬至1939年春，高家屯和付家屯的1到8岁小儿全部死光。当年我嫂嫂的唯一小女儿也死掉了。那年春“窝子病”大流行时，我家只有嫂子和我没有病倒，余者全部摊上。那年头，根本无处延医吃药。大孤山村一带，只有高家围子的洪玉生通点医道（该人只会“栽花”亦即接种牛痘），我们只好把洪玉生请到家里，给家人看病。我一天两趟跑宝清街抓药。有一次抓药归来，走到十二里屯北面，遇见一队兴安军骑兵，我赶紧躲到公路东侧沟边，胆战心惊地向前走着。忽然一个骑兵抽出马刀，嚎叫一声，举刀驰马，直奔我来，吓得我急忙扑倒路沟里，只听马刀从我头上掠过。我被吓得哭了起来，这帮家伙却哈哈大笑地驱马扬长而去。

归屯集甲，建立部落，以及归屯后广大人民群众的苦难生活，简直是一言难尽啊！各地各屯都有一本血泪帐。我讲的只是我经历过的，我听说过的，仅是实际情况的千分之一罢了。

（摘自《宝清文史资料》）

绥中移民目睹记

冯希龄

1945年，抗日战争将要取得最后胜利之际，日本帝国主义者对中国人民的迫害和奴役更加残暴，他们在我县实行了名为开拓实为疏散的奴役性政策。强迫古城寨、毛家沟、陈荫沟、三角屯和吴二沟男女老少300余口，分两批去黑龙江省绥滨县北

10公里的小岗屯，强迫劳动。第一批是在1944年8月30日去100人，由伪绥中县公署郑科附、张属官率领，名为开拓先遣队，均为强壮劳动力，也有泥木手工业者在内。第二批于1945年7月11日出发，共250余口，男女老少全家搬走。我就在这批移民之中，是被强迫抓阄抓着以医生身份随同移民去的，作火车上的医疗防治工作。对这次日寇暴行我是目睹者。

背井离乡 情景凄惨

这次移民，大部分是古城寨、毛家沟、陈荫沟等处的。他们乘直达佳木斯的火车，分坐三节车厢，一天出发一节。我坐的是第三次出发的车，7月13日早9点开车。车厢载移民100余人，当时由伪绥中县公署日伪警察人员带至绥中车站，随即交给绥滨县来的日籍警尉接管。这时车站外面有20余名日伪警察站岗，只许上车不许下车，只许进不许出。上车时，日寇和伪警人员推推拥拥，口喊快快，就连与亲友告别的时间都不给。送别的人群，有的是父送子，母送女，近亲近友送别的很多。我的母亲也同样起大早赶来送行，可是不用说给送些食物，就连一句话也没能说，只能“咫尺天涯，泪眼遥望”。现在我还记得十分清楚，有个韩姓壮年，由车窗探头遥望，被日寇拳打脚踢，打得口鼻流血，我也隔窗看望我的母亲，被日寇踢了一脚推回车内。这样也未能抑制住全体移民和故乡告别的沉痛与流连之情，当时只恨无情的机车恰似雷鸣地吼叫一声，车身开始蠕动，全车移民精神紧张万分，车外送行的亲友泪如雨下，哭叫与一路保重的喊声连接不断，凄惨之状无法形容。有的亲友向前跑送食物，日伪警察连推带打，将鸡蛋、水果打散满地，用脚踏碎。当时车内见此情景不约而同地放声大哭。有的老人泣不成声，悲痛欲绝，全车呈现一片混乱状态。突然听到乒乒乓乓之

声，是日寇大打出手了，并且狼嚎般的大骂“八嘎”。直到车过兴城，人们才陆续忍住了哭泣，每个人精神恍惚，呆呆观望，只凭机车任意拖走，直奔可怕的奴役劳动地点而去。

连遭迫害 饥渴闷热

1945年7月13日正是农历六月中旬伏天，车外烈日炎炎，火伞高张，车内闷热有似蒸笼。门窗全闭，不许开放，全车只在后面鬼子押车的座位那儿开一小窗。每个人热得汗流浹背，呼吸困难。在精神折磨和肉体虐待之下，每个人都敢怒而不敢言。车到新民之后，有位韩大爷猝然晕倒，经抢救复苏之前，对我开口说：“冯大夫你救了我，按道理说应当感谢，可是在今天就不如一口气上不来倒好，咱们可以说是同舟共济一块到祖国的大东北去，恐后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老人又说：“你看见没有，小日本已经撤了，听说俄国马队已经过黑龙江了，小日本不敢惹。这回咱们去绥滨，很可能遇上战事。”这些话我听了感到恐惧万分。我说：“韩大爷，小点声说，鬼子听见，最轻也得吃顿靴子踢。”老人家叹了口气说，“听天由命吧！”

车过新民后，西照太阳更热，车内无水，每人由家带来的水已经用尽，都渴得头晕目眩，口干舌燥，到站也不准许下车取水。大家只有盼望天上下雨，或者到沈阳能弄到点水。当晚10点钟车到沈阳南站，不是停车，而是由于日军在关内吃败仗军车往来频繁，又兼鬼子家属集聚沈阳往大连搬家，因此将这节孤雁似的车厢临时甩在车站，但仍不让下车。正赶上半夜天降瓢泼大雨，人们不顾一切地打开车窗，接雨水解渴。真是饥不择食，渴不择饮。鬼子给每人一个黑面饼子，都就雨水吃了。就这样度过了几乎热渴而死的7月13日这一昼夜。

感染疾病 有医无药

1945年7月14日上午约8点钟，囚车一样的车厢又开始前进。车到四平，许多人，连我在内，都突然发生呕吐，腹泻腹痛和中暑。想治疗却有医无药。临来时绥中伪县公署只给紫金锭10支，痧药2两，十滴水一打，康复10支，其他连酒精药棉都没有，怎能敷旅途百余人之用呢？药品一霎时全用光，只好用针灸放血救急。移民们一再向鬼子要求打开车窗。碰巧鬼子也觉得不舒服了，不住呕吐，又见全体移民病得东倒西歪，就是让跑也跑不动了，他才准许把车窗打开。到哈尔滨站，这个鬼子因病下车，又换了个鬼子的铁路警尉补上来，长相比那鬼子更恶。我还记得他身高不足四尺，膀宽臀肥，圆眼长眉，络腮胡，气势汹汹，活鬼一般，大踏步进入车厢，对每个人都狠狠地瞪了一眼，然后一声嘿叫：“统统地坐起来，不要装病。”可是全车人热渴与疾病交加，怎能坐得起？有的害怕，勉强挣扎起来，有的根本起不来。这鬼子就用洋刀柄打和用手扯，打的车内妇女哭孩子叫，又乱成一片。他看实在起不来了，就叫医生给打针，我说药全用完了，他就骂我“混蛋”。最后他看确实没法了，也喊叫乏了，就拿起酒瓶子喝了一阵，然后像死猪一样地横卧在车厢里，大打起呼噜来。车里的人这才松了一口气。大家说，“我们遭这个罪可真够受的。大鬼子走了又来了这个矮鬼子，真是去了个孙悟空来了个猴。”有位陈老伯说：“俗话说，宁当太平犬，不做亡国人，咱们老百姓有啥法呢？”大家七言八语，悲的是离乡背井，怕的是死无葬身之地。过了两昼夜，7月16日下午约1点，到了离家遥远的佳木斯站。

候船去滨 生离死别

全体移民下车以后，由绥滨县警务科派来警察5名，把开拓移民带到松花江畔，然后上去绥滨的船。叫医生去鹿鸣春饭馆附近的旅馆居住，等绥滨县公署开证明回绥中。随车来的大个鬼子对我说，没有证明回不去，到绥中县不能交差。当时我真是百感交集，心想不管回去回不去，也得与同患难的绥中同乡告别。同乡们对我这一告别都是泣不成声，难舍难分。有很多老乡紧紧地握住我的手说：“冯大夫，你别惦着了，我们是凭天由命了。”那位韩大爷哭着说：“咱们来生再见吧，你这年轻人，只要回去，就能保住命。”这种生别的创伤至今犹在心灵深处，不禁痛定思痛。

我走在去市内鹿鸣春饭馆的路上，看到佳木斯市混乱已极，日伪军警布满街头，乱抓劳工；日本妇女携带箱笼夺车逃往大连。到旅馆之后，我的肠炎病又犯了，幸经鹿鸣春经理王永贵（绥中小庄子人，在家时我给他治过病）相救，才得好转。王对我说，“现在时局很紧张，苏联红军常过国境，日本鬼子要倒台了。现在车票不好买，我开着旅馆能买票。”就这样由他帮助买了票，上车回绥中。因为没有证明，也没敢去伪县公署汇报，就去兴城王保屯我外祖父家躲避起来。

光复以后，这批绥中被迫移民的老乡消息全无，直到1948年绥中解放以后，听人传说，光复后伪满军警和地主土匪武装蜂起，移民的财产衣物被抢掠一空。疾病流行，男女老幼死亡过半。

（摘自《绥中文史资料》第二辑）

日寇在“归屯并户”中的滔天罪行

李艺 孙进

1937年至1938年2月，日伪当局在桦南地区“归屯并户”，建立“集团部落”170个。建立集团部落的过程，是日伪当局在桦南地区制造骇人听闻的法西斯惨案过程。日寇在归屯并户中烧毁村屯120多个，烧毁或拆掉民房2.4万多间，杀害或冻饿而死的群众1.3万多人，荒芜和放弃耕地31500多亩，伤害耕畜4800多头。

1937年冬，日寇在土龙山一带，强迫小村屯的散居户，离开自己家园，迁往指定的部落内，放火焚烧大洼，半截河子等地民户住房，大火着了几昼夜，几百户农民流离失所，无家可归，逼得有的孕妇数九寒天在野外分娩，人民群众饥寒交迫，叫苦连天，惨不忍睹。

火烧家园 逃难四方

——柳春满老人的血泪控诉

1934年（康德元年），我家居住的河北黑咀子山屯（现桦南曙光农场果树场所在地）发生了一场大灾难。

这一年腊月二十七日中午，从湖南营来了4个穿便衣的日本密探，找到屯长说：明天全屯人必须搬到湖南营去，如果不搬，日本人要把房子统统烧掉。说完就返回去了。当时正是数九寒天，天冷得吐口唾液成冰谁愿走呢？这时，全村人心惶惶，有的拴车备马准备逃跑，有的烧香念佛祈祷老天保佑。第二天，

太阳刚偏西，一辆载着日本鬼子的汽车开进了屯子。这些鬼子端着上了刺刀的大枪，挨门挨户串，看啥拿啥，如瘟神下界。之后，两个日本兵拿着蘸了汽油的火把挨家烧房子。全屯27户，32所房子全点着了。火苗被风一吹，窜起3米多高，越烧越旺，不断发出噼啪声响。我们站村外眼巴巴瞅着，谁也不敢去救。大火直烧得日头下山，这伙鬼子才返回去。他们走了，大伙才跑回屯里救火。可哪来得及，房盖都烧没了。大伙哭喊着从火堆里扒衣物粮食，有的又搭起小草棚子暂时安身。人们在冻饿恐惧中熬过了这一夜。

孙井岩整理

灭绝人性 悲愤难平

——孟宪章等五位老人的控诉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之时，我们几个都住在冷家沟（现桦南县桃源村），那时，我们饱尝敌人欺压之苦，整天提心吊胆度时光，不知何时灾难临头。

1937年末，日本侵略者采取归屯并户政策，以维持他们的统治。他们看我们冷家沟没人搬家，便于这年腊月二十三，出动5辆汽车，拉着40名鬼子和柴油，气势汹汹地来到我们村，进村后，首先奔曹子恒家（他们说曹子恒打死了日本官饭冢），扬言要斩尽杀绝。但曹子恒家一人没有，日本兵便点火烧了他家的房子。接着从后街开始，挨家逐户地烧了起来。这还不算，又连着烧了临近的西沟和东冷屯。

那时，正是数九寒天，大风卷着烟泡一个劲刮。火借风势，越烧越旺。大伙望着，不敢上前抢救都流下了悲愤的泪水。当时，有一个叫孙永贵和一个姓马的青年，不忍心眼瞅着烧光，便冲上去抢东西，被日本鬼子发现，当即用刺刀挑死在窗下。曲

万祥的母亲刚生下孩子两天，鬼子兵硬把她从炕上拉出门，她拼死拼活才把孩子抢出来。烧掉了房子，乡亲们只好另投生路。张文义的母亲背着不满2岁的孩子往大岗亲戚家跑。那时天寒地冻，刚跑到邢家沟北岗，摸一摸身后的孩子，已经僵硬了。

这场大火，整整烧了7天7夜，烧毁房屋300余间，粮食20万公斤，烧毁水井7眼，烧死牛马22匹，猪58头，杀死冻死4人，以后因无处安身，冻饿死伤30余人。

郝龙湾、杨春恒整理

滔天罪行 罄竹难书

——许庆祥、梁秀文老人的控诉

1937年冬三九天，日寇强迫南大甸子秦广中10户、检草沟东山老家关十几户，鄂家门前的黑刘，东达连的张六子、于景春、郭青元、陈永满、张维成、王福春，条沟的王玉太、王春山、许庆祥，东山的徐家、杨长顺、卜家、关老五、王汉臣，西达连泡的袁士修、王宝贵等小屯的散居住户，限期迁往九里六。数九寒天去没去处，住没住处，走出去，不是饿死也得冻死，都想等一等再说。事隔才3天，敌人看谁也没动，就气急败坏地放火烧房，大火着了3天3夜，一共烧了五六百户。致使几百户农民流离失所，无家可归。有的在途中冻死，有的死在柴草堆里。腊月二十五，我在途中亲眼看到6个人冻死在一个大木柜中。九里六屯子虽然不算太小，但一下来了几百人吃、住是很难的，我记得当时的情景是，各家的屋都住得满满的。剩下的人，有的在外面支起个小草棚临时安身，有的露宿在各户的柴草堆里，这年冻饿而死的足有百十个人。

更惨不忍睹的是，敌人放火烧九里六后岗老姚太太和东达连泡张六子房子时候，这两位老人哭天喊地，再三求饶，可恶

的日本鬼子竟用刺刀把他们活活挑死在房前。

孙进整理

罪证如山 天理不容

——顾奎文老人的控诉

现在的达连泡，当年是个百十户人家的村屯，在日寇进行讨伐中，这个村遇难者虽只9人，但已足见日寇暴行之一斑。日寇讨伐队听说抗日队伍住在达连泡顾小辮沟的顾文全、王大化、顾德友家，于1937年10月的一天上午，乘坐5辆大卡车直奔达连泡小辮沟而来，一到村边就和抗日军接上了火，仗打得十分激烈，双方都有伤亡，由于寡不敌众，抗日队撤走。敌人进村后直扑顾文全、王大化、顾德友家。他们见房就烧，见物就抢，见人就杀，先后用刺刀挑死了没来得及走的顾文全家3口人，王大化家4口人，顾德友家2口人。又把这3家房子点着，顷刻间化为灰烬。

李洪 整理

（摘自《桦南文史资料》）

我所经历的“归屯并户”

金庆范

伪满洲国的“归屯并户”，给人民造成了无穷的灾难，房屋被毁，农田荒芜，疫病流行，人畜大批死亡。这种灾难我亲身经历过两次。第一次是在老家辽宁省本溪县的一个山村，伪康德3年。日本侵略者先在辽宁下令归屯并户，方圆5公里的散住

居民，集中到一个中心村落。人们不愿意离开自己世代居住的家园，离开就无法生活，因此迟迟不动。后来，在一个大雾弥漫的早晨，日本侵略军开进了山村，不容分说，见房就烧。我们村43户人家房屋，全被烧毁，寸草未留；房屋里的物品也都一并烧光。烧完房子把人全部赶到指定村落，不准回去。明令告诫，有再回到山村的，视为“土匪”，枪杀勿论。在那生存无路的情况下，我们一家5口来到了北大荒。落在本县柳树河子村管辖的一个小屯。

只隔1年，伪康德5年（1938年），桦川也开始归屯并户。日伪政权，首先给划出归并的中心部落，然后限定日期，将部落外的房屋全部扒掉，迁到部落之内。但群众不忍心扒掉自己几代人垒起的家业，便一再推拖。后来限期一到，日、伪、军、警立即下屯开始焚烧。但因这里是平原地区，信息灵通。各家一见火起，再无法脱过，便立即上房自动开扒。这便是我第二次经历“归屯并户”。

扒房子 修圈子

并户的主要目的，就是搞所谓“匪民分离”，割断抗日武装力量同广大群众的联系。归并的屯子越大，“分离”就越彻底。因此，把分散很远的小屯和农户都归到一起。我们那片农户有一百零几家，分住在11个居民点。这次除归到的那个中心屯以外，房子全部拆毁。共扒掉大小房屋200余间，占那片原有房屋的90%以上。其中大院套就有9个。如秦奎君、姚连君、大门孙家、小门孙家、党花先生、徐豆腐房等，都是像样的大院套。并户以前的房子，大部分都是开荒斩草的老房。屋架是松木到顶，五檩五椽；一搂多粗的梁柁；墙框都是石头打底，上面垒“拉合瓣子”，拉合瓣是用草拧的，百年不烂。房盖大部是席子编笆。

外苦羊草，不论大小房屋，都很坚固。这些房子如不拆毁，到现在也大部分还是好房。但无论多好，当时都被强令全部拆毁，一扫而光。

扒房子不是扒倒不能住人为止，而必须把所有墙框全部铲平，不留一点残垣断壁，防止“土匪”利用。开始大家都想把房盖扒掉，留着墙搭个窝棚，以便侍弄地好遮风避雨。可是不准许，限期铲平。小户人家好办，房屋又少又小，很快便铲平。而大户人家不行，自己不能按期铲平，这就又得小户人家出“官工”扒房子。房墙全是拉合辫子很难扒，得先用大锯锯成一段段，然后用马拉倒，所以光扒房子就干了一个多月。

扒完房子还不能去盖房子，还得全力以赴修围子。因为归屯并户不修围子，还不能达到“匪民分离”的目的，围子是300米或500米见方，壕深3米，宽3米。各家按劳力分段，限期完成。壕里面筑3米高围墙，4角修4座炮台，留东西二门。围墙底层用土夯，上面砌草堡子。草堡子除从各院套拉一些外，还得用大洋犁到草甸子去翻。一付洋犁要套8到10匹马。新翻堡子非常沉重，加上草甸子没有道路，一车运不了几块。和泥砌墙还需大量的水，全屯1眼井，400多口人，吃水都不足，所以还得用车去1公里外的河沟里拉水。因此，除人力全力以赴，畜力也得全部出动，田间管理一点也不能顾及。

归屯并户是为了“匪民分离”，“匪民分离”又是为了“治安肃政”，消灭一切抗日武装力量，使全体人民就范。因此，就需实行一整套法西斯政策。在扒房子、修围子的同时，又成立武装自卫团，修警备道，修“局所”（即警察分所），修“望水楼”等等。我们那个百户人家的屯子，成立30人的自卫团，设团长、团副。白天进行军事训练，把门站岗，盘查行人；夜间放哨，防范“土匪”进屯。每天全屯平均要出一二十人，一二

台车修路（有时全力突击）。在并户的同时，区、村政权建设也要加强。在我们屯南7里的柳树河屯设立村公所、警察分驻所、自卫团（村级）等。除修办公用房外，还需修围墙、炮台和20余米高的了望塔。警察分所还修一个笆篱子，以便随时拘留“不良分子”。这一切都得各屯出劳力、畜力、资财完成。因此，并户后，不用说盖房子，就是种在地里的庄稼也铲不上、蹚不上，任其荒芜。

住房的苦处

归并的新屯，原来叫“张老二”屯，共有8户人家，老张家是大户，张老二、张老三各住一个院套。张老二名叫张俊，因此，并户以后这个屯就叫“张俊屯”。张俊屯一百零几户人家中，有90余户是周围的小屯和孤家归并来的。其中包括姚连君（那时大部分屯是以人名为屯名）、夏得把（绰号）、赵广有、党花先生、徐豆腐房、刘柳罐匠、柴家店、秦奎君等大户。近的二三里，远的十几里，400余口人、携男带女、老老少少、鸡鸭鹅狗、牛马猪羊、锅碗瓢盆、破瓶烂罐一齐拥入这个8户人家的小屯，无处住，无处吃。就在空地上划了五趟街，每户分给一个房基号。少数有钱有势的大户，很快在这房基上盖起了新房。大多数人家既无钱又无势，“官工”还出不完，哪有工夫盖房，只好用破烂木杆搭个窝棚。窝棚都是人字式的，两脚落地，没有墙壁，外面披上草，里面铺上草，这就是全家的卧室。至于箱柜、锅灶及其它物品，都得放在外面，物品用草苫起来。锅灶，有材料的支个草棚遮阳，没材料的就露天做饭。晴天还好过，一到雨天，窝棚上面漏雨，下面进水。窝棚里外地面一般高，周围没有墙壁，外面积水多深，里面就淌进多深水，锅灶、物品都浇在雨里。晚上蚊子扑面，家家门前得点一堆草，以烟熏蚊

子，不然睡不着觉。

我们家属于第三类户，既没钱没势，盖不起新房，又没有东西搭窝棚，只好住进张老三家一座炮台。炮台里约3米长，2米宽，上下两层，住进两家。我们4口人住在上层，另一家3口人住在下层。炮台和窝棚一样，里面只能睡人，锅灶和箱柜及其它物品，都得放在外面。炮台是草堡子砌的，周围是堡头子，下面是土地，除了几个炮眼，没有通风透气的地方，又潮湿又黑暗，跳蚤臭虫到处乱蹦乱爬，咬得人浑身起疙瘩，晚上睡不着觉。那年雨也多，麦秋以后天天下雨，院子里踹成泥沼。那时候能穿起胶皮靴子的很少；大小人一出门就得光脚，回来一进门还得坐下来抓把乱草把脚擦擦。一到下雨天更难办，做饭就是个难事，上面揭不开锅，下面生不着火，下雨天做饭就得我们娘仨一齐下手。我拿着锅盖在上面遮雨，我姐姐在下面烧火，我母亲在锅上做饭。我们在炮台里一直住到老秋。下层那户中途搬走了，我们搬到底层，搭一铺土炕，可以睡到个热炕。有一天把草堡子烧着了，把两床破被头烧个圆囫半片，我父亲一件破棉袍，也烧掉了半截前襟。没法穿，索性把后襟也剪去当棉袄穿了。

到秋半季，围子修好了，“官工”也少了一些，人们就抓紧盖房子，否则过不去冬。这次盖房，大部分人家是被“逼上梁山”。不盖，没处住；租房又没有，想盖，要啥没啥，只好各尽所能，能盖啥样的就盖个啥样。头等户要木料有木料，要草有草，要钱有钱，但是缺一样，没有劳力。大家都顾着垒自己的窝，所以头等户也只能盖3间草房而已。二等户盖上个2间；三等户盖个“马架”；四等户挖个“地窖子”。草房、马架，都是指样式说的，实质大部分人家都是垒个窝棚。这些房子大部分是中间立个“悠荡杓”，两头“干压坯”（即把檩子一头压在土

墙上)，上面用破烂木杆一横，能搪住草就算房子。这样的还得算上等户。多数人家盖不上这样房子，只能压个“马架子”。叫马架子，实际是马架式的“地窖子”。先把房基挖下去半米深，周围用土堡子或“羊脚泥”垛起近2米高土墙，上面中间搪上一根木杆，两坡铺上秫秸，抹上泥，苫上草，就是房子。房檐太矮，开不了门，只得从房山开门（这是“马架”的基本特征），门旁留个窟窿，立两根木条，糊层纸，就是唯一的窗户。门，顶好的是木板门。有的钉个木框，用毛草勒上；有一些干脆就挂个草帘子过冬。

我父亲是个刚强人，有穷志气。扛半辈子大活，穷了一辈子，但就是不亏人家，不少人家的。什么都讲凭力气干。原本想到这边来，先“串房檐”（租房住）干几年，打下点底再盖房。可是现在逼得没处住，又不能总住人家炮台，所以，一根木料没有也得盖房。于是，领着我们一面蒔弄地，一面上山砍木头。能盖房的木头得到10公里外的南山去砍，砍下来晾几天，干一千还得往回扛。我父亲一次扛两根，我（13岁）和我一个侄子抬一根。那是8月天气，空手走，来回20公里也是很累的。回来再扛上“满载”的木头，那是苦不堪言的。压得汗流浹背，气喘吁吁，走一段路歇一歇，把肩头都压肿了。上山时揣两个饽饽，渴了就找点山水喝。山上的水也不易找，就得到山下草甸子里找。草甸子水有几天不下雨就生锈，上面还浮一层“油污”。由于常喝这样的锈水，再加上劳累，都坏了肚子。我父亲得了肠道病，便血，一会便一点，一天十几次。没钱治，弄几个红皮鸡蛋蘸红糖吃，吃了也不见效果，还得挺着干。就这样我们老小3人，起早贪黑干了20多天，才把木头弄回来。扛完木头还得扛毛草。扛回来毛草，一家人起早贪黑拧“拉合瓣子”，白天我父亲还得领我们去卖工夫，以便挣几个钱雇木匠和

其它零用。盖房、出“官工”、莳弄地、卖工夫缺一不可，全家老小足足忙乎一个秋天，才算盖了东倒西歪的两间草房。外边安上个板门、窗户弄几根木条立上，糊层纸；屋里也没间壁，锅台连着炕。墙上也没抹泥。就这样，还是在上冻以后才搬进去。由于盖得晚，墙框和上盖都未干就上冻，所以冬天简直成了冰房，屋里周围全是白花花的霜。晚上炕烧热了，满屋潮气，被子湿漉漉的；到下半夜屋子凉了，被窝里潮乎乎的，而被面却冻得梆硬。晚上炕檐放碗水，第二天早晨便冻成冰。

疫病流行 人亡家破

在归屯并户那年夏天，由于生活条件太差，又无住房，家家闹病，在夏秋之际达到了高潮。开始是有些人闹肚子和头疼发烧，以后越来越多，越来越重，逐渐传染，常是全家病倒，大家都叫它“窝子病”。说是窝子病，其实也不是一种病，什么病都有。多数是伤寒、痢疾，也有的是肺炎、重感冒等。还有一些是老病犯了，更多的是妇女病。可那时医院很少，15公里外的太平镇有两家药铺里有“坐堂先生”，能治得起病的可以说百无一人。但有病也都治，求人扎针、拔罐子、挑羊毛疔、挑攻心番、吃偏方等等；稍微有两个“香钱”的，就请大神“跳神”，也有不少人死于巫医之手。并户一年多，那屯便死去六七十人。

那时候屯子里每天都有鼓声（跳大神的羊皮鼓），有时通宵达旦；但几乎每天也都有送殡的哭声，甚至一天几伙。少数有钱人家还能买口棺材，多数人家只能弄4块薄板钉个箱子装出去。有些人家连薄板也弄不来，只好用老辈传下来装衣物的旧板柜装着埋了。

这场瘟疫，我家也不例外，无一幸免。最重的是我姐姐，她

得了伤寒病，病得死去活来。我母亲会治一些小儿的杂灾杂病，就给她揪、拔、搓、扎，讨换偏方等等。有时赶上别人家跳大神，也买两支香上上供、讨个方。就这样安慰着精神，病人还是多少天不吃不睡，大瞪两眼说胡话，颠三倒四。折腾了3个多月，一直到旧历年底才渐好转。病好以后，一头黑发几乎全部掉光，剩下不到三分之一，全身也一层一层往下掉皮，那真应了“不死也脱层皮”的话。

可能是因为归屯并户环境的改变，饲养条件差，所以各家所养的猪、鸡、鸭、鹅和耕畜都多灾多病，大量死亡。

农田荒芜 人民饥寒交迫

在归屯并户之前，无论自有土地或租种土地，基本上都在房前屋后，最多隔一节地（二三百米）。铲地时，早晨起来“打早垄”，干一大气活再吃饭；晚上黑天收工，不用留走路时间。并户后，大多数人家远离自己土地；近的二三里，远的四五里，七八里。不但早晚不能干活，午间还得送饭，不但耽误活，还得浪费劳力。住在围子里也不允许起早贪黑。城门不能早开，也不能晚关，怕“土匪”乘机闯入。所以农民下地干活，早晨到门上等开门，晚上早收工，要抢到关门之前回来。由于地远蒔弄不上，农田大量荒芜。过去三铲三趟，这时二铲二趟也保不住，大量减产。

过去有些租地种的小门小户，到秋天收拾庄稼，没有牲畜，可以男女老少齐下田，连背带扛，把庄稼搬回家去。并户后路远背不动，只好用人工换车工往回拉，换别人车工也得排到后面。野鸡、兔子、孢子、老鼠、野猪等等都出来糟踏庄稼。特别是外围的甸子边、河沟沿等地，更为严重。没等拉回来，在地里就损失不少粮食。租地户，除交租子和糟损以外，就所剩

无几了。本来很多户是上年不接下年，这样一来就更加难过。

并户以前地近，常上粪，土质肥沃都是好地，并户以后因近地好莠弄，有地户都选近地种，租地户种不着近地。远地，没牲畜种不起，种上也不够糟损的，所以只好不种地，专靠扛劳金、卖零工度日。而扛活卖零工也得有人多种地才有处干活。有些大户人家因地远不上算，也都大幅度减少耕地面积。并到我们那屯的农户，原来可以种1.5万亩地，而并户以后只种了6000亩地。并户后第三个年头，日本“开拓团”在那周围建立3个部落，种的全是那屯的荒地。由于大户人家种地少、雇人少，再加上出劳工，穷人种地无法种，卖工没人雇，走投无路，吃不饱、穿不暖、住不安，饥寒交迫，贫病交加。我们那屯有家姓徐的，9口人，5个劳力，吃不上，穿不上，4个成年小伙子娶不上一个媳妇。没有吃的夏天就吃野菜，老太太吃野菜中毒，脸上肿得眼睛都睁不开。有个韩老大，老婆死了扔下4个孩子，小的送给了人，剩3个也吃不上，穿不上，冬天没有被，炕上抱一堆麦秸，晚上孩子们就钻到麦秸里面睡觉。还有个孙宝昌，两口子领3个孩子，5口人一床小破被。晚上给孩子盖，白天他围在上当棉裤穿。这样可以出去干点活，维持一家不死。类似这样的人家不是个别的几户，而是大多数，至少占全屯户数的三分之二。

1945年解放以后，周围的开拓团日本人全部离开了那里，扔下了房屋、土地。屯里的农民陆续搬进了这些房屋，恢复了撂荒的土地才算结束了这场灾难。

（摘自《桦川文史资料》）

桦甸的“集团部落”

王 辉

“九·一八”事变以后，笔者曾在伪满的军队内供职，日伪所实施“集团部落”政策为耳闻目睹之事，今就记忆所及，概述如下：

日伪实施“集团部落”政策的目的在于：（一）杜绝抗日联军与老百姓的联系，断绝人民群众与抗联的各种支援，以期早日肃清桦甸一带的抗日力量；（二）将山区人民集中起来，搬到指定地点的“集团部落”，使人民更好更快地接受奴化教育和管理，便于其有效地实行严酷统治。所以关东军司令官，于康德元年在伪满全境内，就令其所属先行了“三光政策”。桦甸县在康德2年春到康德3年秋止，日军的野战部队（司令官第十八师团长多门中将）和日军驻桦甸的守备队，向桦东、桦南地区，进行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以高压的军事手段，迫使山区的人民归村并屯。以后由日军按其归划的地点，通知桦甸县政府，而后由县府向各村通知，并由警务科派警察至该指定地点，先建设警察派出所或分所，由山区四方来的老百姓，得在村屯长指定地点盖房。在盖自己房同时，还得抽出劳动力，来修建四周围墙，防护沟和附进山岗上的炮楼、警察派出所、自卫团宿舍等。归屯后的老百姓，搬到“集团部落”后，就不许再随便进入山里。村屯与山的距离，规定一般为1.5公里以内；开阔地最多也不超过2.5公里（还得在公路两旁）。除此以外，进山得在视线之内，山后坡则不许耕种，老百姓不得进入山林。在指定

区域以外的山林地带，无论任何人任何事情，都不得进入，违者枪杀（康德6年以前这条规定较严，康德7年以后，上山搞副业，挖人参、药材等，得有警察署或当地警察派出所临时的人山许可证，方能按时进出山林地带）。

日本军进山讨伐扫荡时，在指定规划线以外地带，如发现有人，不论是大人、小孩和妇女，都当做敌人不是良民来对待，一律开枪射击打死；日本军遇见的小房、地窝铺、山洞等，一律用火烧毁和破坏，牲畜也打死，发现一处烧一处，实行“焦土政策”。到康德3年秋为止，基本上在桦甸县全境内完成了坚壁清野和归村并屯。

由山里来并屯的老百姓，到新村屯后，得由本人申报户口，经村警察分所检查户口后，给发放“国民身份证”，家长、青年都得照本人的照片，永久随身携带，以便警察随时检查；如串亲访友进县城时，也得随身携带。如无“身份证”的人，一经发现，一律被警察逮捕关押。被强迫赶到“集团部落”的群众，除自己耕种土地外，还得经常出民工修国道，修桥梁，修日本军用工事，和充当入山扫荡部队的民夫（背给养）；适龄的青年，还得充公差当自卫团，给警察站岗、站炮楼和放哨。

日伪在桦甸搞“集团部落”的重点是在桦甸南边的苏密沟，因连通辉南县，地形复杂，交通重要，抗联活动频繁。当时，苏密沟分为两片，西片以苏密沟为重点称西模范村，包括大隆、榆树、杨树等地；东片以前进大队为重点称东模范村，包括煤窑、团山子、二道沟、三、四、五道沟等。在东模范村时，日军以惨无人道的手段，在屯东沟仅离屯1公里的地方，就随便用枪将朝鲜人朴某打死，另二人重伤，吓得村民一听日军出动，就连屯子都不敢出去。

“集团部落”建成后，主要是由警察来控制百姓。村内施行

保甲制和十家连坐法，每10户设一个户长，在10户中有一家犯法，10家都受罚，用它来控制村内的治安。各家来串门的亲友，都得有顺序的向村公所、派出所去挂条报告。在“集团部落”修建完了时，日军就给新村架设电话（专用的军事电话）。最初有事无事，每天都得向县里的日军报告村内和村外各种情况一次。以后就有事和发生情况时再向日本守备队用电话报告，同时还须向县里的警务科报告。

村政权的头目由伪县政府指定的人员来担任乡村保甲长、保甲长大多由地主、富农或汉奸走狗担任。他们能勾结官府，助纣为虐，鱼肉乡里，残害百姓。在没警察的“集团部落”，保甲长就是土皇上，无论啥事都由他们说了算。在有警察的“集团部落”，他们就指挥自卫团站岗放哨，晚上“集团部落”四门禁闭，在靠近警察分所的大门，夜间由自卫团把守，有事出入，得经自卫团向警察分所报告，经警察分所许可后，方准出入，其他大门一律不开。

编者附记：据1975年稿《桦甸县志》搜集口碑材料时，原吉林师大历史系当时的两个毕业班，还征集到以下史实，并附录如下：

1934年残冬，北台子小桦子沟四周几公里的群众，为了反抗日寇的归村并屯，绝大部分人宁肯受冻挨饿，不分昼夜在深山密林里转。原有的居民点，个个“鸡不叫，狗不咬，户户断炊烟”。日寇爪牙伪警察“刘大马棒”和“孟大绝户”，带着十几名打手，每天在山里巡查，用洋刀硬逼着被发现的群众搬到小桦子沟去。住在山沟里的张寡妇，因病没来得及进山，就被蛮横地刨塌了炕，放火烧毁了房屋。本来已经“归”完了屯子，一旦发现有抗联活动，日寇和自卫团就把屯子一把火烧掉。二道甸子镇腰甸子屯，就曾被烧掉过。全屯40余户，100余间房

屋，全部化为灰烬，连活命的口粮也不能幸免。当时，王成祥全家在浓烟烈火中，只抢出来6只饭碗，1只铁勺和1口铁锅。

“集团部落”是变相的集中营。在归完大屯后，鬼子、警察、自卫团又强迫群众在新屯周围挖大壕，垒高墙，拉铁蒺藜网，修“卡子门”，筑炮楼，把每个屯子变成个大监狱。早晨太阳老高才开“卡子门”，放人出屯种地；晚上，太阳刚落就关“卡子门”，回来晚了，不许进屯。出入“卡子门”都要受到严格盘查，特别是一粒盐、一根线头都不许带出去。上山带饭，不许多带，按人限量。山地还不让种苞米，谁敢种就给安上“通匪”的罪名。屯里青年被强行编为“预备团”每晚轮流上围墙站岗。有时还搞“警备演习”，把所有男人都赶到壕上去“演习”，警察狗子随意闯入民宅借机抢夺财物，奸淫妇女，等等。

日本侵略军在清原 实行归屯的罪行片断

王凤志 吴国华整理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在清原县各地活动的抗联部队，不断打击日本侵略军和汉奸队，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日军和汉奸队不甘心失败，进行几次讨伐都以失败而告终。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侵略者为了彻底消灭抗日力量，断绝抗日队伍与人民的联系，在1933至1935年间，在清原各地实行灭绝人性的“集甲归屯”。集甲归屯中受害最严重的山区是清原南部山区，如七区湾甸子、三区南山城。因为这一带山峦重叠，森林茂密，适于抗日游击活动。所以日本帝国主义者把这一带山区视为眼

中钉、肉中刺，不把它除掉不甘心，因而对这两个区的集甲归屯更残酷及坚决。

清原县当时分7个区，这7个区的人民全部都尝到了归屯的苦头。清原县是个山区，山多沟多树多。因为便于辟弄地，沟沟岔岔全有人家住，有的盖了简易房，有的盖了较好的房子。

归屯之前，日本人告诉3天之内，扒房子，搬家；到时不扒，就烧。扒房上哪儿去住呢？多数房没扒，日本兵来了见房子没扒掉就烧。锅碗瓢盆、衣物、粮食全部烧光。当天就无处住没粮食吃，生活无着落，太凄惨了。正如湾甸子村刘悦增等人所说：“日本兵来了，百姓无活路。”归屯后，依山脚挖个洞，盖马架子房，进屋直不起腰。晚上点明子照亮，鼻孔熏得漆黑。

归屯受害最严重的地区就是七区湾甸子的大苏河村。原住在村屯及沟沟岔岔的人家大约120户，500余口人。零散户不算，村屯有二十几个，经过归屯后，搬到大苏河仅二十几户，其余全部都颠沛流离，各奔他乡。有的回山东老家，有的逃到北大荒，有的投亲靠友。

归屯时，日本侵略军伙同汉奸队、警察，每到一处，将居民赶到一起，由日本侵略军小队长训话：皇军为了保护你们生命财产的安全，消灭土匪，要求你们搬到一起居住。也就是说，大苏河二十几个村屯及沟沟岔岔的人家，全部搬到大苏河一个地点居住。限3天把房子都扒掉，如到期不扒掉，以后统统烧光。老百姓故土难离，大多数人家没搬，3天很快过去，日本马队，挨山沟搜查，见房子没扒，就大发雷霆：“房子统统烧了烧了的”。接着日本兵和警察挨山沟烧房子，这样大苏河地区所有沟岔里的房子都点着了。日军和警察端着枪威胁群众不准抢东西，因此凡是被烧人家的粮食、箱柜、衣服、被褥等都烧光了。农民韩增让5间房子、几十石粮食、14件被褥、柴禾3000余捆，全

都化为灰烬。

归屯后，大苏河房子也是不多的。原先是一家的，这时至少住2家，有的挤3家。炕上住不下，就铺草住在地上，一铺炕有的就住2家，拥挤的程度可想而知了。老百姓的生活困苦到极点了。这样住些日子，就动手挖地窖子，盖马架子简易房住。

日本帝国主义把归屯后空下来的山区划为无人区。在无人区内发现有人就视为土匪或通匪，可以随意开枪打死。林家沟王××在山上锄地，日本兵看见了，立即用机枪打死。西哈塘沟农民于××、孙××正在地里干活，日本兵看见后，同样开枪打死了。有一位姓郭的农民，因丢失牲畜，正在山上到处找牲畜的时候也被打死了。像这样无故被开枪打死的农民不下10余人。

归屯后，人民的负担更重了。搬到大苏河的20户，至多有20余个劳动力，修炮台，四围挖深沟，宽2米多、深2米，夹3米高木障子，都必须和原住大苏河的农民同样干，由于土方多白天干不完，晚间还得干到深夜。在这紧张繁重的劳动中，人们被弄得筋疲力尽，人困马乏，还时常遭到打骂。真是人心惶惶，不得安宁。更危险的是出探子，有钱的人可以雇人替他出探，没钱的人必须自己去。出探时，如果遇到红军，那是很幸运的，红军不仅不为难你，而且准许你如实报告。如遇到土匪，就遭殃了，百般刁难，拳打脚踢，折磨一阵子，回去不是死也是大病在身。出探子回来时，这关更难过。鬼子和警察左问右问，说有情况，他们又不相信，硬是说他通匪，痛打一顿，有的被打后得一场大病，有的被当场打死。据不完全统计，因为出探子被日军和警察打死的人有王武全等5人。所以谁摊上出探子，回来不是死就是伤。受的夹板气，遭的两面罪。

挖成围子之后，出入围子要检查路条，农民白天出去种地，

日头还很高就得回来，晚了大门关上不准进圈子回家了。夜间还得轮流值班给日军警察站岗放哨。

总之，日本兵来了，老百姓就遭殃了，没过一个太平日子。

（张健东 韩增让 老肖头提供，摘自《抚顺文史资料》第九辑）

太平川“圈屯”“并户”纪实

马文贵整理

在长春市“伪皇宫陈列馆”日军侵华罪证陈列室里，陈放着大量图表、照片、实物和档案，揭示了敌伪统治时期侵略者的桩桩罪行。其中，一楼陈列品中摆着一块大沙盘。这是1936年至1937年黑龙江省汤原县太平川集团部落示意模型（见89、90页图）。这块沙盘，使我们回顾起在太平川这片沃土上曾经流淌过的血泪和漫起的浓烟大火。

1936年11月的一次大圈屯，日军就抓走了我抗日志士和无辜群众30余人，杀害了10余人。1937年春节大年初一，又一次大圈屯，又一次更大规模的屠杀。

我们从部分档案资料中看到若干件控诉书和询问被害人的笔录。其中有：刘玉山、李仁的控诉书，有姜明和等4人的控诉书，有李万才、刘万福等14人联名的控诉书，有查询刘奎昌的笔录，还有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调查报告。这些控诉人都是太平川人，控诉件上都有伪皇帝溥仪的认罪签字。日本侵略者和他们的傀儡皇帝在审判台前，俯首承认了在太平川地区大圈屯和“归屯并户”前后犯下的罪行。

太平川，背倚小兴安岭，面临松花江，西去汤原县城17.25公里。这里北有金满沟、大砬子、黑瞎子沟、黄皮子沟、白皮营、红皮营等山区，西有格节河，东傍黑金河，近山面水，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太平川是块红地盘，早在1931年这里便设有中共地下党的区委，1934年前后汤原中心县委也在太平川。

以太平川为中心的十几个村屯，大约在3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先后建立起抗日救国会、妇女救国会、儿童团、打狗队和农民自卫队等群众抗日组织。

伪《三江省事情》中，对所谓的“地方治安肃正”事务，有过部署：“要在治本的同时，加强治标。”其实质是要制造无人区，以切断抗日队伍与人民群众的联系，企图逼抗联于绝路。敌人先是在他们认为的“地红三尺”的红地盘上加强敌伪军警力量，以严密控制局势，镇压群众抗日活动，随时“讨伐”抗日队伍。那时的太平川区真是军警密布、戒备森严。敌人遍设保甲和十家连坐，严密地封锁人民群众，并且向这里的人民群众挥起了屠刀。

1936年冬打冻场时，日军进行第一次围屯，1937年春节大年初一，又进行第二次大围屯。这是一次敌伪早有预谋的大规模清乡围剿行动。敌伪军警宪特倾巢出动，给太平川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

大年初一天还没亮，太平川周围的村屯就被日伪军警严密包围起来。在黄有屯，敌人敲门砸户，端着上了明晃晃刺刀的大枪，挨家挨户搜查、抓人，除了孩子和女人以外，把全屯男人都驱赶到李长顺场院去过筛子。守备队的金翻译（朝鲜族）和“讨伐”队的警察们配合日本人往出“挑坏人”。他们按汉奸特务们密告的名单，把人们分成两排，打骂了一顿之后，放了一部分人，把另外的40余人押送到太平川日军守备队。同时，围

屯也在其它村屯进行着，在枪刀威逼之下，又陆续抓来了许多人，都关押在耿家大院里。敌人这次突然袭击大圈屯，抓了108人。

汉奸地主耿子修，因为上年被夏云杰军长抓去在抗联密营里关押过3个月，认识我们一些抗日人员，便借机向日军效忠，日本人把抓来的群众排成一行，顺次从窗前走过，耿子修在屋里从窗眼往外看，密认“反满抗日分子”。108人中被他“认”出了68人。这些人在耿家大院被关押折磨了四五天以后，押送到汤原县城日军守备队驻的小青楼去。

被关进小青楼的人，九死一生。人们经常听到从这里传出受刑者的惨叫声。凡被抓进去的，通常都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被抓去的人遭受灌辣椒水、坐老虎凳、压杠子、狼狗撕咬、刀劈火烧等各种酷刑。最后大多数人被用汽车拉到汤旺河，塞进了冰窟窿里。刘海清和老任头被折磨死以后，竟然被丢在街里李家木铺的两口空棺材里。

太平川被抓到汤原县城小青楼去的人，后来只放回王左撇子大哥王傻子和刘才、刘海楼等6个人，其余62人都惨遭杀害。死难的人有：康正发（中共汤原中心县委书记）、刘海龙哥仁、刘福君、曲稽查、倪桂林、老任头、丛凤林、王左撇子、关永海、关永江、李长福、刘福春、刘仁福、任均衡、金殿君、滕福春等；仅黄有屯就惨死37人。加上前一次圈屯惨死和零星被杀害的，太平川区共被害110余名抗日志士和无辜群众。

被日军扔在井里淹死或杀害后扔到井里的，除了前孔家井里的，还有黄有井里扔进去的洪树臣一家以及由外地捕来的3人，安洪富井，被害家属去烧纸发现井里扔进七八具尸体，其中有赵德春一家人；董家大井里发现有6具不知姓名的尸体。

日军往井里扔人大多是在夜里或乘人不注意时才下手。除了前孔家井里是一次推下20余人外，其它井里的尸体都是事后发现的。董家井，座落在一堵堡子墙下，原来没人知道井里埋过人。那时候，屯落稀，人烟少，野鸡多。附近有人下套子，见墙根井旁总是有野鸡逗留，并且飞下井去啄食。下去一探查，才发现井里石块下面埋有尸体。我们访问张传福的七弟72岁的张文东老人时，他说：“前孔家井里埋的人最多。”

在太平川曾发生过杀人焚尸事件。刘仁禄被日军抓去，他的家属托邻居梁万福、贾老疙疸两人去守备队担保。日本兵用刺刀逼着梁、贾二人扛着木柁，走到太平川南门外。日军头目用战刀劈杀了梁万福和贾老疙疸。然后堆上梁、贾二人自己扛来的木柁，浇上汽油，把他俩的尸体焚烧灭迹。

继一连串秘密捕杀、大圈屯之后，日伪军警对太平川区的治安肃正“治本”措施便开始实行了。按照这个计划，整个汤原县境内将在黄花岗、吉祥村、永昌屯、东江沿、施家亮子、五保、二保和太平川等8处，建立“集团部落”。其中太平川是个重点。凡是定点的周围村屯，都得毁掉原有分散的居住宅舍，迁到指定的大圈子集中居住。日本人限定期限，到期不搬迁的一律烧毁房屋，用军警威逼搬离自己亲手建起的家园。1936年至1937年之间，大部分居民被强行并到集团部落，少部分群众被逼得四散逃亡。

1950年12月，中央最高人民检察院调查员就此事件进行了调查。调查报告中说：“1936年，伪满洲国为了断绝我抗日军与人民的联系，在太平川划定东西宽600米、南北长660米的范围，建立集团部落。将太平川村及邻近的齐家屯、姜家屯等12个村庄的居民，除部分逃散它处外，约有370多户赶入太平川集团部落。上述村庄被烧毁或扒掉的民房4490余间。在该部落周

围修筑了3米高、2米宽、长达844米的围墙，围墙外面挖有1.5米深、3米宽的水沟。水沟外面设有2米高的铁刺网。还筑有大小堡垒9个。同时，部落内设有伪察警署和日本守备队各1处，以监视人民的行动。”

归屯并户给人民群众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十几个村屯的居民，在日军烧杀淫掠逼迫下，损失了难以计数的粮草、家具和衣物。行动稍一迟延，便全部遭到大火焚毁。仅是荒芜的耕地就有6万亩。许多被逼并到集团部落的人家，一时没有住处，只能用秫秸搭窝棚栖身；入冬以后，泥水结冰，盖棚子垒锅灶非常困难。那些被迫流散的户，走死逃亡，流离失所，境遇更加悲惨。

距太平川1.5公里地偏西北，有个刘盛金屯。全屯人想要硬抗着不搬迁，没按日伪指令及时归并到集团部落里去。日军守备队、警察“讨伐”大队和汉奸特务们一窝蜂地全部出动，把这个屯子严严实实地围了起来，不准一个人走出。之后，挨家挨户抓人，不分男女老幼一个不剩，全都驱赶到村头大场院里。逼人们跪下，挨个地用棍棒毒打，人们被打得头破血流、皮开肉绽。接着就点火烧了全屯的房子，押着15户人家并入了太平川集团部落。

刘盛金屯的刘奎昌，和全屯人一道抗着不愿并户。伪警察大队在烧房子以前架上机枪，对准这所房子往屋里扫射了一排子弹。刘奎昌的妻子和女儿正在屋里抢着往外搬东西，枪响后急忙躲避，吓得趴在炕沿下面。母女俩虽然当时没直接被枪弹射杀，可惊吓成疾，不久就死去了。刘奎昌就此家破人亡，押去大围子时，连点口粮都没抢出来。

刘奎昌被逼到大围子里，对集团部落里的非人生活感受很深。光复以后，他说：集团部落里看管得特别严，那里是四门

岗哨，出入人马车辆都得搜查，凡往外运粮草就以通匪论处；规定三五个人不准结帮走路、谈话，夜间不准插门、点灯；夜里特务四出活动，暗查偷听；警察特务是两天一查户口，三天一查夜，来客得报告，经过准许才能留宿。有个叫荣德库的，刚一天黑躺在炕上和家人唠闲嗑，被警察偷听发现，闯进屋好个盘查，还毒打了一顿。还有个叫李仁的，一年冬天去汤原街里办事回来晚了，大围子四门紧闭不敢叫，只好蹲在野地里，冻得受不住便和另外四五个人冒险爬墙，让警察给抓住了押在炮楼里，被打得死去活来，第二天才放回家。

在长春伪皇宫陈列馆，还存有一份《1936年伪满洲国在黑龙省汤原县二区太平川地区实施集家并屯所造成的损失统计表》（见附表），列出了集家并户的村屯、户数、房屋和并入流出情况，统计有全部烧毁和扒掉的房屋数字。这份统计表上当然无法列出刺刀的威逼，没法描述日军的两次大圈屯、归屯并户以及敌人对抗日人民群众的杀害。然而，透过这些数字却有力地显示了日军的残暴，人民的苦难，这火与血的历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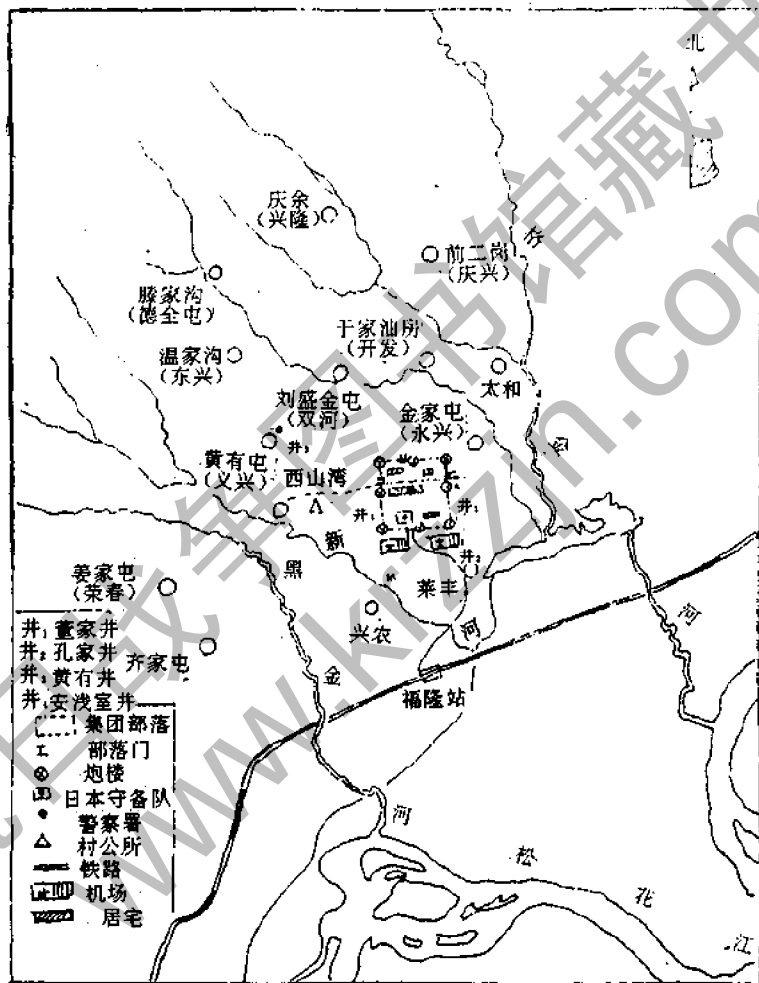
附表:

1936年(康德3年)伪满洲国在黑龙江省汤原县二区太平川

地区实施集家并屯造成的损失统计表

距太平川里 程(华里)	村名	户数	房屋		并屯状况		烧毁房屋		备 考
			座	间	并入太平 川户数	流出他处 户 数	座数	间数	
	太平川	500	1 000	3 000	130	370	1 000	3 000	全部烧毁或扒掉
3	刘盛金屯	15	20	70	10	5	20	70	同上
6	于家油坊	50	60	200	30	20	60	200	同上
12	杨风礼屯	8	8	20	6	2	8	20	同上
17	庆余屯	10	90	100	10		30	100	同上
12	滕家沟	30	40	90	10	20	40	90	同上
8	温家屯	20	40	60	20		40	60	同上
5	黄有屯	80	140	400	50	30	140	400	同上
15	姜家屯	90	140	270	2	88	140	270	同上
12	齐家屯	30	90	180	1	29	90	180	同上
8	蔡家屯								
	荣家屯	20	40	100	10	10	40	100	同上
	郭家屯								
合 计	13	853	1 608	4 490	279	574	1 608	4 490	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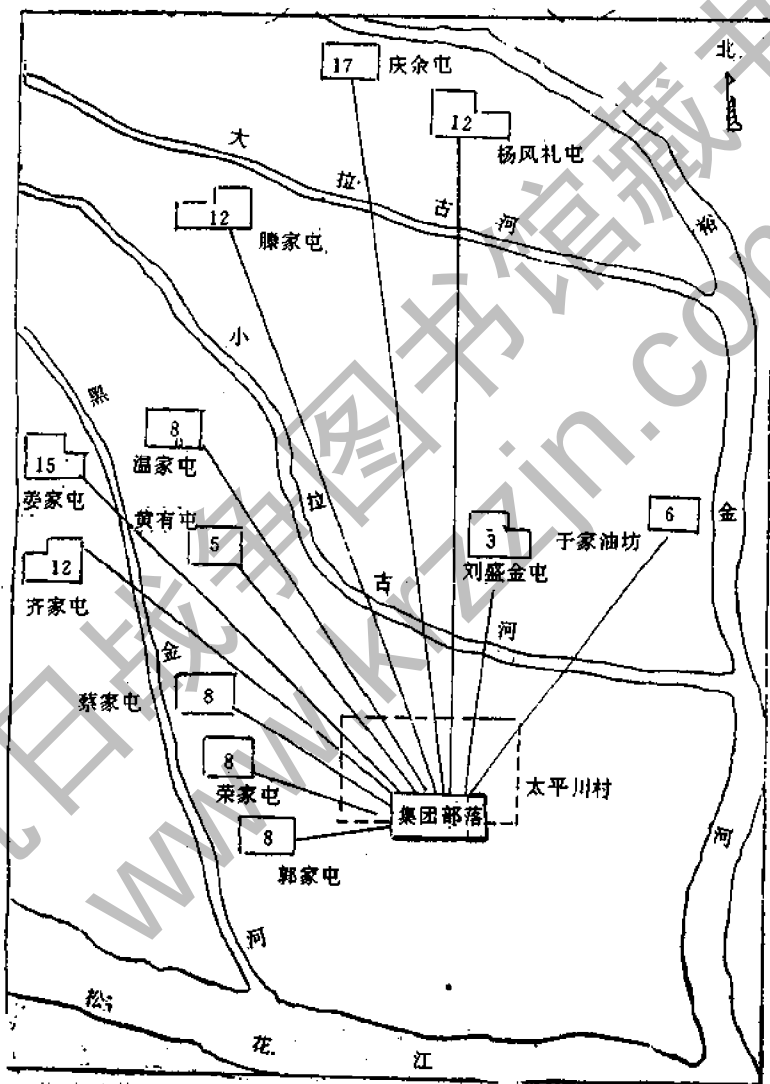
(1936——1937 年)



黑龙江省汤原县史志办公室供稿

太平川集团部落示意图

(1936—1937 年)



归屯并户使我家破人亡

郑方便

我家原来在浑江错草顶子沟的二道阳岔住。在满洲国日伪黑暗统治时期，二道阳岔屯里共有9户人家。我们家在二道阳岔盖有三间土坯房，以租地和开荒地种大豆、苞米来维持全家的生活。日子虽然比较艰难，但还能半年粮食半年糠菜度日，全家9口人过着半饥半饱的苦日子。

记得那是在伪满康德3年（1936年）春天，大约是阴历三月下半月的一天，早晨八九点钟，从沟外进来一伙荷枪实弹、点着松树明子的日伪山林警察队，由队长曲学文带领二十几名警察闯到我们居住的二道阳岔屯里。他们闯进屯里后二话不说，见房就点火烧。屯里人事先谁也不知道，大家伙都吓坏了，不知为了什么，山警队连各家各户的仓房也不放过。见鸡抓鸡，见猪捉猪，见有好吃的和好东西就抢，并且不许人们去救火。眼看着自己家的房屋被警察狗子点着了火，烧得噼里叭叭直响，火苗越窜越高。当时我大哥郑方福去六道沟街里没回来，我大嫂正坐月子。在屋里还没出来，吓得连哭带喊。我二哥郑方禄在家，一看还有3口人在屋里没出来，房子就给点着火，烧得火苗直窜，就急眼了，马上搬来了梯子，爬上房顶去救火。这时警察队长曲学文一回头，看到有人上房去救火，马上举起了手枪，瞄准后就开了枪，距离很近，一枪就把我二哥郑方禄从房顶上给打了下来。我二哥掉滚到房屋下面。我爹、我妈还有我急忙跑了过去，抱起了昏迷不醒的二哥。一摸身上粘糊糊的，沾了

一手血。这才发现刚才一枪正打在我二哥的胸脯上，通红的血把胸前的棉衣染红了一大片，血水还在不停地冒着。二哥痛苦地想说点什么，只见他微微地张了张嘴，连句话也没有说出来，头一歪就咽了气。当年我二哥只有22岁，正是年青力壮的时候，哪想刚才还活蹦乱跳，眨眼工夫就被狗警察给打死了。他犯了什么罪？我真气红了眼，起来就要扑上去和杀害我二哥的狗队长拼命，却被我爹、我妈死死地拉住了。这时，我大嫂怀里抱着两个孩子，也挣扎着从屋里爬了出来。山林警察队在我们屯里放火烧了全屯的30多间房子，又开枪打死了我二哥，并撵我们到沟外部落里住。然后他们一伙又闯到别的屯烧房子杀人抢东西去了。

我家三间住房被日伪警察给烧毁了，行李铺盖烧成灰，大豆、苞米在场院里也都烧光了。所有吃、穿、用的东西都被一把火烧没了。当天就在附近挖了一个坑，用苞米杆子把我二哥的尸首卷起来，捆上三道草绳放进坑里，草草地理葬了。我们既没处住又没吃的，全家8口人可怎么活呀？我们全家分头东找西找，好不容易在棒槌营的林子里找到了一个没被烧毁的地窝棚，全家人都挤住在这又小、又暗、又湿、又冷的地窝棚里。两个出生才12天的孩子，经不住烧房这么折腾，只过了两三天就相继死去。我大嫂连吓带伤心，加上又冷又饿，在月子里得了重病。家里借了不少债买药，她一连吃了近一个月的汤药才保住了一条命，人也瘦得只剩下皮包着骨头。我们全家经过这次日伪警察归屯烧房子，由9口人减少到6口人。

当年秋天，日伪讨伐队又进山来烧房子，他们见房就放火，谁不搬走就杀谁，见好东西就抢。我家刚刚盖的三间房又被一把火烧得一千二净。这次全屯所有的房子又都烧光了，全屯的人也全都被赶下了山，都集中归到错草顶子和大杨树村。

日伪统治集团为了分离抗日联军和老百姓的鱼水关系，妄想用“归屯并户”和“三光”政策来吓唬住老百姓，以此来达到消灭抗联的目的。由于“归屯并户”，山里的老百姓家家受害。据我所知，光四道沟、六道沟一带山里的房子就被日伪讨伐队烧掉了上千间，被无辜打死的群众就有二十多人。我们家只是受害户之一。

（宫秉忠整理，浑江市政协文史办供稿）

残暴的“集家并屯”

李一鸣

1931年9月，日本关东军司令本庄繁以两个师团（本庄师团与多门师团）和满铁守备队三个团的兵力，发动了震动世界鲸吞东北的大事变。我富饶的东北广大国土陷入日寇之手。但是，处于水深火热中的东北3000万同胞不甘屈服于敌人铁蹄之下。事变后不到一个月，各地就相继组成很多武装团体、队伍，同敌人展开了血肉斗争。仅在满东、南满地区就有赵亚洲、金山好、老北风、唐聚伍、李春润、邓铁梅、长山好、大刀会等，高举反满抗日旗帜，向敌人展开斗争。可惜当时缺乏统一的组织和领导，被敌人各个击破，广大的爱国志士、义民，只得四处潜伏，待机再起。他们又遭到汉奸、走狗的出卖，因而丧家身亡者不知有多少。日寇在当时的抚顺守备队、抚顺宪兵队均设有恶狗圈，每将反满抗日的“犯人”投进狗圈，则狗噬人噬，血肉飞溅，惨绝人寰。敌人虽如此凶狠，但摧毁不了爱国志士们的斗争热忱，反而坚定了要把民族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与

其隐伏遭到汉奸走狗的陷害，还不如敌人斗争到底，为国战死为德为荣。因而在1933年至1936年间，青纱帐起，警报频传，抚顺的日帝守备队和伪警察队时遭阻击，疲于奔命。

敌人认为山谷中的居民和零星的自然村落恰是“土匪”（敌诬蔑爱国志士的称呼）孳生、联络、补给和生匿就食之所。倘将这些住民迁进大屯，烧光山谷间的房宅，则“土匪”就绝根断线，无处就食，亦难集聚，警报即自然减少。且山谷居民归屯之后，宛如集拘笼中，不但便于管理统治，亦且便于奴役压榨。日寇企图收一箭双雕之效，因而施行“集家归屯”的残暴手段。

敌伪为了达到集权于县便于统治的目的，乃废除区一级，扩大村一级政权编制。1935年11月末将抚顺全县改划为1街、30个村。12月中旬各街村在敌伪监视下开始选举街、村长。1936年1月5日纠集各街村长在抚顺城中学校址受训，为期四周。同年3月1日，各街村开始办公，兹将改划后当时的行政区划列表说明：

伪抚顺县街村区划表（1933年3月）

街村名称	公 所	划入主要屯名
抚顺街	新抚顺	新抚顺、旧抚顺、大官屯、南站一部、榆林堡
抚西村	抚顺城	马金庄、永安堡、抚顺城、欧家屯、施家沟
兴会村	会元堡	会元堡、金花楼、新堡、四家子
方晓村	里仁屯	方晓屯、里仁屯、戈布街、连刀湾、滴台
黄金屯	下黄金屯	上黄金屯、下黄金屯、上寺、康乐屯、赵尔台子
前甸村	前甸屯	前甸、二道房子、鲍家、台山、靠山、大甲邦、大河
公家村	公家寨	公家寨、两家子、三家子、肖家砬子、下头冲、上头冲、中二冲
章党村	下章党	上章党、下章党、门进沟、关岭、刺沟、东沟
上年村	上年马洲	上年马洲、古唐沟、下年马洲、三家子、富尔哈、小寨子

街村名称	公 所 所在地	划入主要屯名
河清村	河清寨	河清寨、北窑沟、长岭子、上哈达、关门山
达德村	下哈达	下哈达、阿及卜子、石门寨、得古、哈达背
营盘村	营盘	营盘、二伙洛、高力营子、新屯、洼 沐、驿马站
铁背村	铁背山	赶马河、铁背山、城子后、东沙浒、沙浒、案墅
得力村	得力俄哈	得力俄哈、塔子沟、江南河、李家卜子、依木沟
东社村	东社	东社、西社、小社、台沟、温道河子、紫花岭
甲邦村	小甲邦	小甲邦、茨城子、关口、吴家卜、心太河
搭连村	搭连	搭连、新屯、万达屋、老虎台、龙凤、夜海沟
古家村	古家子	古家子、四家子、姚家砬、上马古山、下马古山
张甸村	张家甸	张甸子、罗卜沟、碾盘、马和寺、平山子
塔村	兰山角	兰山角、塔二丈、五味子、养树园子
得士村	南花园	南花园、英得卜、千金卜、邓尔屯、干猫子、蛇窝
关山村	大东洲	大东洲、连刀湾、王木砬子、关门山、小东洲、磨力屯
马郡村	马郡韩	马郡韩、教兵台、小林庄、孙家卜子、十轿子
塔峪村	塔峪	塔峪、汪家屯、英家砬、小南沟、山城沟
石城村	石文厂	石文厂、前孤家子、后孤家子、汗卜子、关山
望花村	大朴屯	大朴屯、小朴屯、柳树屯、北后屯、五老屯
松岗村	松岗峪	松岗卜、汤牛沟、拉古峪、陡山子、山城子、大甸子
景峪村	景家峪	景家峪、养树园、松树沟、邵家东沟、毛公卜
闾老村	闾老沟	闾老沟、八家子、柏家楼、驷达卜、英守卜、瓦房
高官村	高官村	高官寨、花岭、滚子沟、桦子沟、五百牛禄卜子
海浪村	下海浪	上海浪、下海浪、松树嘴子、磨大山、楼子沟
计 31		

每一行政村辖5~7屯，每屯辖3~5部落，每一部落或辖5~8道沟或辖3~5自然村落。

1933年7月下旬，日军驻抚顺山上守备队长将集家归屯方案通知伪抚顺县参事官山下满男。限期自8月1日至8月15日完成边境集家归屯任务。8月1日山下邀约伪县长赵仲达和立寅田太指导官（日寇派在警务部门官衔）。伪县署即不张贴布告，更不作临时宣传，仅在行动的前一天用电话通知各有关村公所。村长通过电话，再分头召集各有关屯长通知集家归屯的紧急措施，屯长回屯后再通知各部落长。由于时间上这样短促，而各村屯长又未能迅速通知，对被集家归屯事前毫不知情，更谈不到事先有什么准备，突然在光天化日之下横遭火烧住宅，逼迫搬家，在这猝不及防的情况，怎能不叫喊连天，哭声动地。

伪抚顺县当时被指定集家归屯的边境地方计有120余个部落，在8月前必须集完的部落有11个，余均缓期到9月1日自动归并。当时被指定的营盘村高力营子屯下窝棚部落（包括秋皮沟、老背沟、崔家坟沟、老虎洞沟、大房身沟、小房身沟、葛地沟、东方十字沟、石人沟、坟沟、大东沟、小东沟等13个自然村）情况十分惨重。

8月4日傍晚4时许，崔庆廉夫妇在秋皮沟东岗（距下窝棚街约1公里）劈青苞米，从沟外开来大卡车两台。一台内载的是戴钢盔的日帝守备队，另一台载的是伪警察队。车开进下窝棚内，一时街上就乱起来了（勒令家家倒出房子的一半）。人声嘈杂，形势显然紧张险恶。崔知事不妙，即同其妻扛着一麻袋苞米棒赶回家（秋皮沟）去。喘息未定，见汉奸李春和领着伪警察5名从沟外向沟东崔振林家走去。一个伪兵拿着一束引火草把，并把火点着。另2名伪兵高声喊道：“屋中有人没有，有人快走出来，要烧房子啦。”崔振林妻一人在家，突然听到外边喊

声，出门一看，吓得一句话也说不出，目瞪口呆，不知所措。一个伪兵对她呵斥说：“马上要烧房子，屋内东西还要不要？要快往外边拿！”这时崔振林从沟里汗流浹背上气不接下气地跑来。听到了伪兵的话，情知哀求无用，急催其妻和他进屋将衣物粮食等从窗户向外抛出。但万恶的李春和已将火把触点檐头，霎时间红火黑烟冲天而起。崔庆廉不敢再犹豫观望，立即通知北邻张焕金家速抢救东西；又叫小孩迅速跑去沟里通知孟繁德，自己同妻急将屋内衣物粮食等向外抢救。搬运尚未完毕，火焰已烧上檐头。沟东沟西，浓烟弥漫，烈火熊熊，直冲云霄。崔振林妻坐在沟边放声大哭。张焕金妈跺脚捶胸呼天喊地。40多年来若祖若父苦心经营血一滴汗一滴建立起来的房屋、家园，一眨眼化为灰烬。触目伤心，莫此为甚。这时伪兵已将孟家住宅烧着，接着是大东沟、小房身沟。凶猛烟火，红遍天空。号哭声，真是震撼山谷。崔等正在泪眼模糊，又听得伪兵喊道：“还不向下窝棚街搬去，去晚了就没有住处了。”人们才陆续向下窝棚街集结。崔庆廉还算好运占得了周庆勋一铺小南炕。家具安插铺行李就绪，出街一看：下窝棚小街已到处是人，但西沟、北沟、东沟三条道上仍有大量人群涌来。儿喊娘母寻儿，女哭男嚎，前后相接。有哭昏的，有气疯的，有寻死的……真是哀鸿遍野，一幅摧心裂胆的流民图景。

入夜时分，各处火光浓烟渐熄。日寇的警备队和伪警察队已集合乘车开走。剩下这一些无家可归衣食无着的老百姓，像做了一场恶梦似的。然而并非作恶梦，确确实实是活生生的浩劫，继而大家又纷乱起来，有的回到旧地觅得残缸破罐；有的扛来未烧尽的木材；有的上山劈青苞米准备粮食；有的急急寻找，安排住所……有住仓房里的，有住碾棚里，甚至有住马圈子里的，但仍有半数人无处可住。晚饭时，情景倍感凄惨，有

不吃的，有咽不下饭的，街外、巷口……到处炊烟，街头巷尾，流泪眼观流泪眼，断肠人望断肠人，谁能料到午前尚能自给谷粟，半日之间顿然变成了缺衣短食无家可归的难民！

事后调查，这次日寇施行残暴的集家归屯计划，仅下窝棚一部落被集家的37户，被烧的草正房78栋203间，草厢房40栋89间；简易房、牛棚等28处。至于各家被烧毁的粮食、农具、衣物、家具等更无法核计了。再如归屯之后，由于离耕地较远，因而荒芜土地约1000亩；修围子、筑炮楼、站岗、巡哨等劳役几乎占去全部落的劳动力。损失约计20万公斤以上粮食。至于精神上的痛苦，集拘后生活上的种种灾难，就难于描述了。当时有这样几句民谣：“天荒荒，地荒荒，日本兵来了遭了殃”，“天灾能躲，人灾难防”。

8月5日晨，部落长崔庆珍（他也是被集家户）召集农民们开会，商量住宅、秋收和修围子等问题（修围子是8月4日敌寇守备队小队长的指示）。讨论半天，没有结果。这时岭东又火光冲天，浓烟滚滚，知道是瞎子伙洛、洼子伙洛同时放火了。会议在这一刺激下无法开下去就自动散会。同日午后，传来消息说，住宅须尽量修建在下窝棚街向外扩展，木料随意砍伐，除木工、泥瓦工酌情补助外，建宅户自备小工和一切宅内修建。并闻从8月8日起，要勒令大家开始挖围子，人工、车工按户摊派。这对于流离失所的灾民们来说，又增添了一个意外的重负。

下窝棚部落从8月7日起由本部的180个劳动力，7辆牛车、13辆马车共干361天（包括秋收时间在内），分别建成简易住宅18栋（并非集体统筹修建，只是由部落长奉令摊派人、车搬青石，拨木、石、瓦匠，其余主要是由各家自行设法修建）。每栋住2家、3家或4家，加上下窝棚街原有的11栋，仅能解决59户的住宅问题。其余38户，或迁往远亲戚家中，或租修仓房，

甚或迁到高丽营子屯内大庙廊房、学校教室的，勉强度过寒冬。

在人们赶筑自己住宅时，8月15日敌伪勒令开始修筑围子。用马车运石头，牛车运黄土，并拨部分马车去元帅林站拉铁蒺藜。同时安排木工上山砍木桩（木桩长1米，小头直径0.1米），瓦工、木工砌炮楼，另外一部分木工挂铁蒺藜，绕围子一周。铁蒺藜外挖护庄壕深2米，宽度上边近3米，下边3米，向里边垒土埂，埂上埋木椿，椿埋半米多，上挂6道铁蒺藜，间隔0.3米。围子的四角各砌炮楼一所，石头座，土坯腰、木材盖。腰部下部留有枪眼，楼内方3米。限9月15日竣工。9月16日营盘警察署前来验工。

这两项重大工程，对一群亡家破产、衣食无着饥寒交迫者来说，生活之惨不言可喻。特别是吃的问题最苦，秋收时全部男女老幼均下地抢秋，由于农时被夺，这年虽无天灾，但人祸连绵，因而十成只收了八成。家家的青苞米，早已吃光，除了交地主一部分租粮外，几乎没有剩余。户户缺粮，甚至在中秋节时，就没有粮吃了。穿的问题也最愁苦，烧房子是家家拆洗棉衣、棉被时候，未待絮成，棉胎等即被烧去，天气寒冷，浩劫之余绝大多数人缺衣少被，冻得直打哆嗦。并因新房屋冷，地下潮湿，采暖更属不易，一时得了疾病或致死的，时有所闻。

全县集家归屯工作完成后，10月末伪县长赵仲达、参事官山下满男、上田富夫、翻译张云桥、指导官立田寅太、翻译张心如等乘轿车3辆和2台大卡车载着伪警察一个中队在武宪斌中队长率领下，大批人马开往营盘村来进行视察。他们先到达高丽营子屯地主朱成祓家，大吃大喝了一顿之后，就来到了难民的学校教室和大庙（莲花寺）的东西廊房，参事官、指导官等仅在教室外望望。赵县长和张云桥由朱成玉屯长引路从东庙门走进，赵县长刚跨过山坎，就听到墙下边有呻吟声。原来是

洼子伙洛杨山嘴子住户杨俊卿因吃稻糠悻悻拉不下来屎，正撅着屁股让他妻用棍子在肛门处往外抠，疼痛难忍，是以呻吟。县长不能再瞧下去了，走进廊房。廊房3间，住满难民，恶臭气流扑鼻而来。素日养尊处优的这位县长又不好急于出去，只得用手绢捂着鼻子，病人呻吟声，幼童啼哭声，小儿号寒声，妈妈哄慰孩儿声……交响一片。再看这一群面黄肌瘦、浮肿虚弱的流民，也许表示厌烦，也许有动于衷或内疚于心，赵县长蹙眉疾首，郁然而出。又向西廊望了一望，就同张翻译走出庙外，临去时让张云桥和朱屯长要了杨俊卿家吃的稻糠悻悻一个携回县署，他们离开学校后又乘车到下窝棚巡视一周，看看围子工程，然后返回抚顺县署。次日去得力营村，李家堡子。又次日去海浪村，松树嘴子。视察算是完毕。事后，赵县长说：“被集家归屯的部落最苦的是李家堡子”。试想：下窝棚惨状已如此，而更苦的李家堡子又当如何呢？其悲惨遭遇就更不堪设想了。

视察之后，他们看到了这些无辜受害的难民而实无法活下去，若不施点小恩小惠，势必把这些人逼上梁山；或者成批死去后，奴役压榨的对象就没有了。乃由山下参事官和抚矿务局商讨结果，由炭矿拨5 000元，抚顺街商会援助了3 000元。买了高粱800袋（每袋75公斤），按每户1袋高粱5元现款施以救济。在救济粮款中扣出领粮、取款、开会、马料等开支，难民每户所得皆不足数，杯水车薪，何济于事！因集家罗难而致病死、气死、或疯或傻的，比比皆是。仅在实施救济前的一次调查中查明，被集家归屯而致死亡的人数竟占全部归屯人口的30%以上。

这次日本侵略者在抚顺县边境上共烧了下窝棚、瞎子伙洛、洼子伙洛、竖碑、三家子、李家堡子、坎木沟、五百牛碌堡子、台沟、碾子沟、松树嘴子等11部落附属的山谷居民住宅（其他

山谷零星散户勒命拆除者不在其内)。这对百姓来说是一个巨大的灾难。全抚顺市区3县不知有多少地方,受到了同样的灾难。同时对反满抗日的革命力量也确受到一定影响。但日寇的阴谋伎俩及其毒辣手段并未能摧毁中国人民坚决要求解决自己的斗争意志。与敌人的意愿相反,东北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的抗日的力量一天天发展壮大起来,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摘自《抚顺文史资料》第九辑)

集团部落的罪证

马广和口述 刘明廷代笔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吴家乡也沦陷在日寇铁蹄蹂躏之下。国难当头,民不聊生,劳苦大众,背井离乡,妻离子散,怨声载道。

1933年春,日寇为了进一步统治压榨中国人民,在庞家村(现东兴村)实行集团部落(并户),把后庞家、前街、树园子、杨家堡、五家堡5个自然屯,61户并到前庞家屯(部落点)。在部落点四周挖成围壕,东西长2000米,南北宽500米,壕高2米,宽3米,壕上每隔1米埋有椿柱,拉上密密的铁丝网,东西有卡门,在屯中间设有18米左右高的守望台,可随时监视全屯人的行动。指派马钧生为部落长,管理一切上派任务。

在挖围壕时,只限10天完成。达不到质量(高、宽、深)要求,除了返工重修,还要挨打受骂。81岁的门树林老大爷说:“那时候吴家乡归盘山县管,在盘蛇驿设有第7警察署,有个日

本人叫池野指导官，带着张翻译，经常来屯检查督促挖囤壕进度。有一天我们屯王化清（半病子），中午回家吃饭，正赶上池野指导官带着张翻译来检查。他们一看这段没人，大吼一声：“人的哪去了？快快的找来。”这时王化清吃饭回来了，池野指导官上去就是一脚，张翻译随后就是两个耳光，紧接着把王化清按跪在地下，足足跪有两个多钟头。

69岁的刘显廷老大爷说，县里的九济指导官带着警察大队，也常来督促集团部落（并户），限十天搬进指定的庞家屯（部落点），稍有意慢，非打即骂，逾期不动，强行拆掉住房。因此这几个屯60余户，200余口人，有的搬到王家窝铺；有的搬到咬沟屯；还有的被迫逃到北大荒，真是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并到指定的部落点的有30余户，100余口人。由于没完成日寇的计划，在县九济指导官和张大队长指使下，警察大队100余人，前来拆房烧屋，并说这个几个屯的人，有反满抗日行为，造成了“五家堡惨案”。

五家堡归盘山县管辖，20余户人家，因房产土地都在这里，不愿离开故土。可是，盘山县日本人九济指导官下令7天之内全部迁进指定地点，逾期不搬，就强行拆房。我们屯里人誓死不离此地。

1933年秋季的一天，九济指导官，派伪县保安大队长张雨森，带领保安队100余人，来五家堡强行逼迁，叫我们屯人并到庞家屯。

就在这天早晨由屯西边鬼鬼祟祟来一个人，身穿青布衫，头戴礼帽，左臂上背着一支长枪，腰间系着子弹袋，手拎着八分新的匣枪，中等身材。这个人进屯后直奔崔富家上屋，一进门就强横地说：“我们的绐子（大帮土匪），都在屯西小马套（地名）等着吃饭，我叫红飞，赶快把白面、粳米拿出来给我们做

饭。”崔家人说：“我们没有粳米、白面。只剩点用小缸捣的高粱米，要用就拿去吧。”这个土匪红飞，就挨家逐户进行搜寻，结果没搜着粳米、白面，在全屯只找出有30多个鸡蛋和7只小鸡。就叫崔家给煮饭煮鸡蛋，杀小鸡。屯子里人一看来了胡子（土匪），都顺着屯子西头的小壕沟跑了。土匪红飞一边监视崔家做饭，一边屋里屋外来回走动，往远方窥视。没等饭煮熟，红飞就发现由屯西头来了一个骑白马的，稍近些，看出骑马人斜背着马枪，穿一身灰色伪保安队军服。红飞三步并两步地弯着腰，跑到崔家院内的猪圈里，手拿大枪担在墙上，对准骑马来的保安队员，砰的一声将人打掉马下。后边还有两名骑马的保安队员，是前来探听消息的尖兵。被打死的保安队员叫白玉贵。

后边的两个骑马队员，拨马就往回跑。后边的100余伪警察保安队员听到枪声，立即持枪催马，边走边散开，把五家堡屯围个水泄不通。从四面八方，对着屯子乱打枪，子弹像雨点一样，吱吱直叫。土匪红飞见势不好，边还击边往屋里撤。保安队边打边缩小包围圈，全部火力直对红飞射击。红飞见势不好，不时探头向外张望，想借机逃跑。后来被逼蹲在崔家的锅台灶坑边，拿锅台做掩体向外射击。最后伪保安队直爬到窗户台下，将红飞击毙于灶坑边。

土匪红飞虽被击毙，但伪保安队怕受土匪埋伏，还在疯狂地向五家堡屯内扫射。直到屯内没有枪声，才进入屯内。

这时伪保安大队长张雨森气得面如土色，穷凶极恶地说：“给我搜！五家堡没好人，见人就给我绑上，五家堡的东西一点不留。”这帮匪兵按着主子的命令，挨家逐户搜寻，翻箱倒柜，没跑掉的老少都上了绑，集中在屯西头“土地庙”门前。

我老叔马宝成那年才18岁，是身体健壮的小伙子。他为了躲避并户，于正月间搬到河西王家村去了。今天为了回来看看

地，刚一进屯正赶上保安队和土匪对战，跑到老范家躲起来，不料也被搜查绑了出来。保安大队长张雨森指着老叔马宝成说：“你们五家堡没好人，都是胡子，非杀掉不可”，老叔接着说：“长官，我是好人，不是土匪，我家几辈子都是庄稼人，正月我家搬到河西王家村，今天我回来看看地，赶上了这事……”张大队长大吼一声说：“不但要杀你，还要把五家堡杀个鸡犬不留！”老叔再三央求，而保安大队长暴跳如雷地喊着“把铡刀给我抬出来！把这个土匪给我铡了！”于是两个队员，把铡刀抬出来，又有两个队员把老叔按倒在铡刀床前，大队长喊了一声“铡”！年仅18岁，善良憨厚的庄稼人，我的叔父马宝成就这样惨死在保安队长的铡刀之下。

紧接着大队长张雨森又指着绑跪在一旁的翟永富说：“把这个土匪给我毙了！”于是保安队出来两个队员，把翟永富推到小庙东侧，叫他跪下，可当时翟永富说什么也不跪，说：“我是好人，是庄稼人，不是土匪，就是枪毙了我，你们也得不着什么”。这时跑出一个小队队长，硬把翟永富按跪在地上，另一名队员对准翟永富，一连3枪，但是枪没打响。这时长泡子张老国出来说：“这人命大，是好人不能毙，放了他吧！”就这样翟永富才免遭枪杀。可是翟永富松绑回家，3天后，因惊吓病死。

老叔马宝成和翟永富惨死之后，全屯的群众带着愤恨的心情各自回家了，以为这回可没事了，哪想到家破人亡的大祸又来了。保安大队长张雨森的狗头一晃，又生下狠毒计，命令保安队去各屯搜寻灯油。保安队员纷纷去东南堡、杨家堡、前后庞家等屯，抢来不少煤油。张又下命令：“把煤油倒在各个草房上、柴火垛上，然后放火。队员们奉命倒油点火，时间不大，整个五家堡屯变成了一片火海。大火一直烧了一天一夜，共烧掉草房57间，柴草垛60余个。两天时间把一个好端端的五家

堡，变成了一片废墟。”

五家堡被烧平的第二天，伪保安大队张雨森，率领部下100余人，抬着我老叔马宝成的头颅，回盘山县向其主子九济指导官请功领奖去了。

我们五家堡群众并没有被吓倒，坚持不并户，在附近亲友家寄居。“八·一五”光复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重建家园。但是我们五家堡人，对这个血泪史，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摘自《北镇文史资料》第八辑）

榆树县娄家屯事件

王绶之

榆树县第九区土桥子街警察署，在伪满康德元年（1934年）春，由同县警务科派来日人指导官1名。他到位之后，就召集该区内所有保甲长开会。会的中心内容就是小屯归并到大屯去，可以避免土匪的扰乱，限期10天内归完，否则以通匪论处。土桥子东岗有个六七十户人家的大屯子，叫长发电。该屯南岗有个六七户人家的小屯子，叫娄家屯。该屯最大的一户姓娄，当家的叫娄希彦。指导官命令他们把娄家屯归到长发电去，但他们未能照办，到指导官规定的期限，未能把娄家屯的房子拆掉到长发电去盖。原因是正在春耕时忙着种地，又兼拆房子盖房子，几十间同时动工，也不是10天期限能办完的。再加上归到长发电去，来回种地很不方便，所以他们不愿意归，因而到期限未归。于是指导官大怒，一天半夜，带领警察保甲长等数十人到了娄家屯。当时人们正在屋里睡觉，指导官命令把该屯所

有人家一同用火点着。农民们听火声呼呼地响，知道是失火了，所以先发觉的人跑到院中大喊失火了，快起来救火啊，于是睡熟的人从梦中惊醒，男人急忙跑出去救火，妇女们抱着未穿上衣服的小孩，照顾着行走困难的老年人，拥拥挤挤地逃出屋外。大家到院中一看，指导官带些警察，还有保长孟宪功、助理李树范等也都来了。指导官说把房子给你烧了，看你们还归不归。这时大家才明白，火是指导官点的，老幼连惊带吓，缩成一团。还有被火烧伤的，叫苦连天，悲惨情况不忍目睹。稍有良心的无不落泪，但是鬼子还令警察往火堆里赶那些人，农民们被迫在万分痛苦的情况下不得已一齐给指导官跪下，异口同声地祈求“太君”留命，鬼子说你们反抗归屯就是通匪，就应把你们烧死，现在仅把你们的房子和东西烧了，这算便宜你们。各家当家的到火中去抢救自家的东西，指导官不让向外抢，口中还说烧了好，烧了好，这回你们就走了。房已着落了架，也没法向外抢东西和救火了，他们只好亲眼看着自己辛勤劳动积累下来的房屋、牲畜、粮谷、柴草、用具、农具和鸡鸭鹅猪等，均被烧掉，牛马烧得乱叫，敢怒而不敢言。娄希彦几次跳火堆里自尽，均被救出，长发电的人们看到娄家屯火光冲天，青年们都拿着救火用具争先恐后地到娄家屯去救火，到那里一看不让救，并且也救不住了，长发电的人们见到哀鸿遍野的惨景毫无办法，只好扶老携幼，把人们救到长发电去了。鬼子一个命令，娄家屯六七户人家和所有财产，未用一天时间，完全成为废墟。

归围子强行并屯 烧房屋惨不忍睹

张德玉

日本侵略者围剿我抗日武装力量，在杨靖宇抗日联军经常活动的地区，强制“集家并屯”，大搞“集团部落”。尤其在山区，几乎是见房就烧毁，见行人就抓杀。农民百姓无家可归，哭天号地，走死逃亡，其状惨不忍睹。

1934年（康德元年）日本讨伐队伙同伪警保甲在新宾县境到处烧房子、毁住室，各山沟谷盆的散居小屯，全部被毁掉，人们只好挤住到大村堡的亲友熟人家。

1935年（康德2年）各小屯小堡百姓的住房被烧毁后，有的仍不愿到大堡子去住，舍不得离开自己的房舍园田，就只好在被烧落架子的房框子里，依靠残存的山墙，搭起窝棚居住。新宾满族自治县大四平乡缸窑村农民高庆环的母亲赵淑珍老太太，在丈夫被日本兵杀害、房屋被烧毁的情况下，只好在半拉岭子下的房框上搭柴草窝棚住下来。当时周围三里五村的住户大都走净死绝了，只剩下她带着两个孩子，大的女孩10岁，小的男孩6岁，在这窝棚里从春住到秋。可到了冬天就怎么也熬不过去了。赵淑珍老太太收拾些柴草压在窝棚上面，又用柴草围住后面、左面和前面，人来回出入，扒开前面柴草一个缝当门。在地上堆起草叶睡人，上面再用草叶盖上。取暖就用三块半大石头，上面放上块破泥盆片，底下生火取暖，瓦盆片里烧苞米粒充饥，有时将小苞米穗整个放在火上，烧个糊巴再吃。

一天，大雪下的挺厚，雪后起风，刮得天昏地暗，周围几

里地无人烟、无灯火。天黑后，来了一群狼，围着赵老太太住的小窝棚窜来窜去，嘴插在雪里“嗷嗷”嗥叫。赵老太太把两个孩子紧紧地搂在怀里；一动不动，就这样熬过了一夜。第二天亮出来一看，小窝棚周围被狼踩出了一条条爪印，可幸没有钻进窝棚里，真是“狼口余生”。

1936年（康德3年），日本侵略者开始强行归屯并屯。那时，窟窿榆树有400余户人家，2000口人，集家并屯后，全村约住有1100余户人家，5700口人。一家挤住三四户，一铺炕住两家、甚至三家人。四平街（今小平村）村民姜有山因反对集家并屯，被日本兵抓去监禁在“拘留”里，后来死在狱中了。

日伪当局为了严密封锁行人，在集家归屯后，命农民们在村边挖壕3米深、3米宽，壕底里埋上树桩子，拉上铁刺线，并在东南西北4个角修筑了4个炮台，每个炮台都有2层楼高。在窟窿榆树，警察署衙门内也修筑了4个小炮台，警察保甲轮番值勤，监视村内外可疑行人。

在日本侵略者“三光”政策残害下，窟窿榆树地区被烧毁的房屋棚舍计有：

窟窿榆树（今大四平村）	11间
四平街（今小四平村）	120间
西河掌村	99间
东升村	310间
缸窑村	80间
样尔沟村	220间
闹枝沟屯	60间

共900间，自然屯被毁6处。

在葦子峪地区（包括今马架子、东小堡、四方台、西川、李麻子、草盆乡），共烧毁房屋6112间，仅草盆村上下排及南山村

(皆旧治)，被烧毁的房屋就有一千四百多间。归围子前，南山村（6个自然屯）共八百多户，三千二百多人，归围子后仅剩九十多户，不到400人，其余的人都走死逃亡了，大部分人被冻死饿死在外，许多人家连一条根都没留下，绝户了。据当地老年人讲，当时逃荒的人，“象扯绳子似的”，拧着劲往外出逃，走在路上，随时会遇到冻、病、饿死的人，没有掩埋，没有管顾，夜里就被野兽撕碎吃掉，再也找不见尸首。

集家并屯以后，人口极度集中，一户中挤住三四家，一铺炕也住八九口人。1937年（康德4年）春天，各地闹起窝子病（即伤寒病），得了这种病的人，红头胀脸，身上滚烫，喘，浑身无气力，不下20天，就送命。这种病还传染，一人患病，全家难免。一天天都有死人的，哭叫之声不绝。病人死后，家里人将一根大抱绳从房前扔过房脊，意谓把病人的魂灵捆住，其子登上房顶呼叫病人“××，你回吧！”其女趴在“富台”（烟囱）脖上大呼大叫。若是小孩死了，其父母或兄姐就用一块烧纸蒙在碗口上，水瓢里舀上点水，绕房屋走一周，让水瓢的水滴到蒙纸的碗上，边烧边走，边呼边叫病孩的名字。回屋后，将滴在碗纸上的水给病孩子喝下，谓之拘魂。然而召灵拘魂，并没能唤醒死去的人。病的人多，死的人也更多。人死了没有棺材装，没有人往外抬，只好用草卷上埋了。

苇子峪、草盆、下夹河、马架子、大四平地区，当时闹窝子病死的人，共有1214人。南山村有一大户叫杨成霖的，一家19口人，没下一个月，就死了16口，那3口因出远门而幸免。当这3人赶回家来的时候，一看家里的样子，立时瘫在地上。那凄惨状，不忍睹，不忍闻！

（摘自《抚顺文史资料》第九辑）

伪满“强化治安”人民遭受涂炭

陈惠英 王惠臣

1936年，日寇要在海城什司县地区修建庙宇岭、大台沟、小女寨、三棵梨树、茨沟等“集家部落”。3月间，伪海城县公署召集了山区村长会议，指派日本官员池岛、板田、牧野为总头目，汉奸郭尚贤、徐翻译等为帮凶，策划“并村”阴谋。先以海城东南与辽阳接界的山区村屯为点，将3村或4村并为1村。当年4月开始动工，依山跨河，大兴土木。村四面挖土围，筑高墙，墙高近2米，下宽1米多，上宽1米，墙上立木杆，高1米多，拉上铁刺线网。土围四角各筑高大炮楼，黑洞洞的炮口对着四周。每个“集家部落”都有驻伪警察一二名，另加派武装自卫团十余人把守。

伪警察手持战刀，强迫小林自然屯的居民，扒掉原有住房，限期迁到“集家部落”内。当时弄得鸡飞狗跳，烟尘滚滚，百姓叫苦连天，其状惨不忍睹。茨沟、大台沟二村，沟长5公里，二三十户人家祖代相延居住，院落整齐，不愿迁走。在日寇威逼下，只好忍痛拆毁，含泪搬迁，三村一共合并为150余家。

拆旧屋，盖新房，困难重重。秋天9月间动工，到天寒结冻时，房屋还没建好，泥水不和，只好草率收工。这年冬天，并村的老百姓户户挨冷受冻。

“并村”不但给百姓财产造成重大损失，而且在生产、生活上也带来极大困难。住在“集家部落”的人，要到一二十里去种田、种菜和养蚕。

在修建“集家部落”时，日寇和伪警察，到处抓车、抓人，强迫百姓去为他们挖土、运石、筑墙，还大肆砍伐树木，乱挖田地。时值初秋，庄稼尚未成熟，也强行拔掉，修炮楼、做木栅，大修警备道，以使各“集家部落”与伪警察署沟通。修海城县小女寨至辽阳县交界的柳家岭的5公里警备道，抓了民工数千人，在日本鬼子、伪警察、翻译的鞭打下，冒死苦干。当时有个郭股长，领着日本鬼子，到处鞭打民工。碰着干活冒汗的人，一顿抽打，说是“冒虚汗，就该打”；碰到干活没冒汗的，骂他们“干活不出汗，偷懒”，更是一顿鞭打……。

但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有不少民工偷偷溜到附近树林中躲灾避难。在修什司县至庙宇岭的警备道时，一些民工利用伪警察贪财心理，拿出几个钱给警察“递小项”，用钱贿赂监工的伪警察，然后溜号……

当时，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

民国改满洲，

逼人把道修。

中间脊梁骨，

两旁挖成沟。

民工不愿干，

就用鞭子抽。

一人一张票，

然后把号溜。

再凑几个钱，

就去壕盘沟。

有的玩纸牌，

有的把烟抽。

有的骂鬼子，

有的编口溜。

“并村”胡扯蛋，

早晚翻满洲！

从这首民谣，可以看出当时百姓的反抗情绪，盼望着光复的心情。

仅据在三棵梨树一个“集家部落”的调查，因为“并村”而拆毁民房达300余间，砍伐树木上万棵，给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当时在人民群众中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

满洲国事真新鲜，

并村集户砌土圈。

扒掉民房无其数，

砍掉树木有几万。

昔日森林一扫光，

今天到处是荒山。

“集家部落”怪事多，

男喊女哭苦连天。

时冬腊月无处住，

眼望旧房泪涟涟，

新房木，抹黑烟，

大瓦房，露着天。

这后两句话说“新房木，抹黑烟”、“大瓦房，露着天”是指被迫搬迁盖新房时，不准老百姓用新房木，新房木都用去修炮楼了。老百姓为掩盖日本鬼子和汉奸的眼睛，只好往新房木上抹黑烟油子。“大瓦房，露着天”是指并村时，原有大瓦房被扒掉，只剩一片残垣断壁的凄凉景象。

伪满时日本鬼子“强化治安”，人民遭受涂炭，从“集家部落”并村一事中，可见一斑。

（刘多学整理，摘自《海城文史资料》第一辑）

集团部落政策下的康德屯

曲 波

1933年，日本侵略军占领虎林县以后，全县抗日烽火随即燃起，人民群众给抗日部队运送粮食，购买弹药，缝制被服……积极供应军需，使抗日战士如虎添翼，动摇了敌人的殖民统治。敌人十分恐惧，急于割断人民群众与抗日部队间的联系，于是敌傀儡伪满内务部发布了“集团部落”文告，从1936年（伪康德3年），开始归村并屯，修墙筑垒，推行所谓“匪民分离”的镇压政策。康德屯就是在这非常时期敌人刺刀下的产物。

康德屯（现新民村）一带，三面依山，一面傍水，地处虎林县城通往完达山的要冲，是抗日队伍经常出没的地方，也是敌人“讨伐”抗联的必经之路。因此，日本鬼子决心严加控制，早在1936年秋，筹建虎林县城经迎门顶子（迎春）达宝清大和镇军用公路时，便开始整治这一带的老百姓了，威逼他们在公路边修建康德屯。

在此以前，屯民都在山前山后的林莽中散居，以种地或当雇工为生。1936年秋，日本鬼子下了死令：各户都去建大屯，不准散居，违抗命令以“通胡子”论处，要“机枪突突”，“以火焚尸”。这道命令一下，老百姓户户毁家舍地，哭嚎连天，背井离乡。

住在东山坡的大户吕海臣，兄弟7人，共三十几口人，同住一个大院套：南北两排大房，东西两趟厢房，每趟房子都是7间，共28间，一水儿亮堂堂的土叉草房。院墙是用木柁子垒起来的，

有2米多高，四角都设有土坯垒的炮台。家有五六杆连珠枪。吕家自1924年起便营建这所大院，多年辛劳，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在归大屯时，眼看这么大的家业一毁无遗，全家人肝肠寸断。

农民曲吉成，原在太平小南山住，他性情耿直，有个犟脾气。在逼他搬迁时，来了犟脾气，险些受害。他满腔悲愤扔掉居住多年的小房土井，两手空空来到康德屯，全家人起早贪黑搭个地窖子（在地下挖坑、上面搭窝棚）住下。那时，家家户户都在将就着住，一片忙乱凄楚景象。

贫户王青元，全家6口人，只有他一个劳力，吃不上穿不上，归到康德屯时，没有被子，盖草包，老婆披麻袋片，孩子光着身。全屯200余户，800余口人穿戴都像叫花子，家家都像逃荒户。

在建屯的同时，鬼子就逼着老百姓建围墙，都是无代价出工。从草甸子挖来大块草垛子，一块块垒起自己的牢笼。围墙底坐宽近2米，高3米，四角是垛子垒的炮楼，高出围墙1米，炮楼基座里外都比围墙突出一部分，顶上苫草，里面搭火炕，能住人，四面有了望孔，能从里往外打枪。整个围墙呈四方形，只在南面留个出口，安个笨重的木制大门，有3米多高，马车出入自如，汽车也可勉强通过。大门外还有个木制小岗楼，由伪军把守，后来又换成了警察。整个康德屯其实就是一座集中营。军、警、宪、特都骑在老百姓头上逞凶。

建屯头一年，有伪军一个连驻守，最多时有100人。连长姓屠，是日寇的一条忠实看家狗，老百姓出入大门，他上下乱嗅，吹胡子瞪眼，老百姓的脑袋都在他一句话上。一年后，换上了警察，有三十几人，领头的叫官队长。从此只换头头，不换兵。警察们无恶不作，无缘无故揪住一个人就说是“通匪”，硬勒“大脖子”。这里的屯民也确有不少人给抗联送过粮，为避免灾

祸，只好递上几个钱了事。那时老百姓吃大米，有豆油是“犯法”，见到就抓。1943年（伪康德10年），农民曲吉福在虎林县“聚生厚”商店买了15公斤豆油，马警长晚上到家，气势汹汹，要连人带油一块送宪兵队。曲吉福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分给他半桶油，这才没事了。

和气村（伟光村）有个宋警尉，看见康德屯有一家做豆腐的娶媳妇，就来揩油了。他一摸梁柁上有灰，就吵闹着要“罚款”。人们知道这个宋警尉曾在王家屯（吉庆）借检查卫生要勒索宋二，宋二因耳聋听不见，被他弄到“笆篱子”里打得死去活来。因此，要娶媳妇这家见他又找碴，赶紧往他怀里塞东西，打发他走了。

有些警察贪婪得很，连小东西也看上眼。一个叫王承恩的警察，娶老婆办酒席，借老百姓一个大号泥盆就不还了。人家来要盆，他虎下脸说：“你再要就不客气了！”说着就要动手打。谁肯为一个盆惹麻烦，只好作罢。

除军、警，屯里当时还有个坏蛋叫王德，他是抗联的叛徒，非常凶恶，到处熊人，勒“大脖子”，人们对他恨之入骨，但也不敢惹他。

屯里百姓头上除了有枪逼着，还有伪政权压着。康德屯1937年开始设屯长，第一任屯长吕海臣，第二任杨振德（1938年至1939年），第三任倪成会（1940年至1945年光复）。屯长的工作是管辖送兵源，安排“国兵漏”出劳工，组织民工“送出荷粮”，拉砂石垫道修公路，打草喂军马等。繁重的无代价的劳役，使群众受尽了欺压凌辱，苦不堪言，为此经常和屯长吵架，甚至动武。

不过，也应看到有些屯长由于抗联部队及其外围组织的压力和工作，他们同时不得不暗地里为抗联帮忙；默许老百姓为

抗联部队送粮，对出去给抗联建密营的屯民睁只眼闭只眼，有时甚至按抗联的意图行事，当鬼子来检查，常应付胡弄鬼子，说：“什么事也没有。”

归屯后敌人控制很严，山里抗联队伍的给养发生困难。

1937年10月1日，一支山林队来攻打康德屯。当时，守屯的伪官长是王永振，领着20个警察，一听枪声，吓得先跑了，山林队乘势进了屯子。但是，王永振一伙并没跑远，在屯南的小山岗上向屯里打枪，与抗联交上了火，一边打，一边等待援兵。这使抗联动员群众破坏屯垒的计划受到限制，只匆匆烧了村公所，就撤退了。不过有一个意外的收获：在伪军逃跑时，叛徒王德没有跑，他以为抗联不知道他叛变，就大模大样地迎上前去。抗联战士问：“谁？”“我是王德！”战士们说：“过来吧！”王德正得意地往前凑——“砰！”的一声枪响，这个叛徒被击毙了。

从总的形势看，敌人实行归屯政策，采取集中营式的统治，起到了断绝抗联给养的作用。群众要给抗联送粮食，必须冒着生命危险闯过敌人的封锁，因此次数少多了。屯民曲吉成在归屯前那年都送粮，有时还帮邻居送，送得紧时连3天都不隔。归屯前他送过80多次，而归屯后只送过二三次，而且每次都冒着极大的危险。从全屯来看，归屯前送粮近千次，而归屯后还不足100次。我县所有村屯情况都差不多，因而，抗日部队近乎断了粮源，遭受到饥饿的威胁。而敌人“讨伐”却越来越频。周旋在虎绕地区的抗联七军，从1938年到1939年平均3天和敌人打两仗，抗联战士凭着坚强的意志，夏天吃蘑菇、野菜，冬天吃木耳、橡子、草根，坚持战斗。为解决军粮问题，抗联曾在完达山密营中种了几十亩地。可是由于队伍和敌人打仗经常转移，因而接近成熟的庄稼被敌人毁了。

在挽救民族危亡的抗日战争中，康德屯的群众和抗联部队

结下了生死情义。特别是归屯后，在敌人严密监视下，群众冒着生命危险，坚持送粮，实在可佩可敬。据七虎林河交接点和在外接收人员的回忆，康德屯给抗联送粮食的农民有二十几人，部队曾给一部分人发过支援抗联的证明。至今仍然能记得起来的有：张文山、曲吉福、黄永田、苏老五、王福元、曲吉贵、冷振发、李兆德、吕大锁子、冷连文、曲吉成、曲少庭、纪洪宽。

（摘自《虎林文史资料》）